

劉伯溫與「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考溯*

陳學霖**

摘要

本文探討中國家喻戶曉的元朝末年漢人密謀以月餅傳訊「八月十五殺韃子」，在中秋節夕起義推翻蒙古統治的民間傳說故事的來歷、史源，及其與政治和民俗發展的關係。這些民間傳說反映元末江淮漢人不堪蒙古虐政，揭竿反抗的集體記憶，內容始初沒有點出誰策劃以月餅傳訊，後來才歸功於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溫。這位被民間神化為神算軍師、遺下〈燒餅歌〉預言書的明太祖謀臣，便成為這個膾炙人口的故事的主角。這些故事不見於元代或明清的史籍雜著，而是在清末透過口碑傳述，由文藝家增添枝葉記錄下來。有關故事亦見於蒙古族的傳說，並有蒙文鈔本傳佈，顯示漢蒙兩族民間文化的交流。

這些「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不是信史，因為元末農民是在彌勒白蓮教的煽動下起事，地方豪雄遽起爭霸，經過十多年的鏖戰，元朝才傾覆。不過，現今各類型故事所講述的蒙古虐政，如「十家漢人養一韃」、「十家合用一把刀」、「姑娘出嫁，甲主先取得初夜權」、「二十戶漢人編成一閭，派蒙古人當閭長」等，都反映一些歷史現象，並不全是虛構。故事的雛形見於清光緒年間首次刊行的元初徐大焯《燼餘錄》，反映蘇州吳縣在蒙古兵進入後所受到的殘虐待遇。編造故事者大致以此為文本，摘採《元史》及蒙古族相傳元朝虐政的記載，加以改造和小說化，並很可能在八卦教的宣傳下，套用其閭八月十五為紅陽末劫、彌勒降生、變天之日的謠言，增飾內容。最後，把神化了的劉伯溫當作策劃月餅傳訊的主謀，合成完整的「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奇故事。

* 收稿日期：2004年3月15日，通過刊登日期：2004年9月23日。

**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至於何人編撰和傳播這些故事？很可能是反清排滿的秘密會黨分子，或同路的革命志士，利用漢人起義推翻蒙古統治的集體記憶，太平天國以「韃子」為滿洲人的蔑稱，加上劉伯溫〈燒餅歌〉識言預測滿清滅亡的傳說，以蒙古影射滿清，作為配合鼓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漢民族革命的宣傳。在清末的排滿浪潮，和民國成立後大漢族主義的情緒推動下，這些故事變為家傳戶誦的中秋節日的民間傳說，到現代仍然流傳不衰。不過，經過不同時代政治意理和詞彙的洗禮，今天編寫故事者已不再使用民族階級鬥爭的理念，和「殺韃子」這個蔑稱少數民族的詞彙，抹掉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歷史痕跡。

關鍵詞：劉伯溫、劉基、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月餅、殺韃子、
蒙古人、元朝

—

元朝末年，兩淮地區群雄蠱起，領導民眾揭竿起義，推翻近百年的蒙元統治，無疑是中國二千年帝制歷史的一大事件。這一方面由於蒙古政權貪婪腐敗，無視各種政治不滿，尖銳的社會經濟問題，徒知以暴力壓迫人民，激起水深火熱的農民，在彌勒白蓮教宣傳「明王出世」的煽動下群起反抗。另一方面顯示在蒙古統治者的專政下，漢人遭受異族的殘虐迫害，排外的情緒凝聚成爲一股強大的抗爭力量，終於促成元朝政權的滅亡。這些事件不但在現存的元明官私史籍、文集、雜著有歷歷記載，民國成立後，滿清異族統治的禁諱得以解除，漢人反抗蒙古暴政的集體歷史記憶，在民間的歌謠、戲曲和閭閻談薈也表現無遺。到現代仍家傳戶誦，流行不衰。有關元朝末年漢人在中秋節夕起義，殺害蒙古官員，推翻元朝政權的轟轟烈烈革命事跡，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便是本文要討論的劉伯溫「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說故事。按：「韃子」（「達子」）一詞源出韃靼，原爲北方遊牧民族的一支；隋唐崛起，與契丹及蒙古等族爭雄，後爲成吉思汗征服，宋、元人泛稱蒙古各部爲韃靼，明人亦以此稱元亡後的蒙古族，近代漢人稱蒙古及滿洲人爲「韃子」，

係有鄙貶之意。¹

中秋節是中華民族一個最著名的傳統節日，相關史料及文藝作品極豐富。²「中秋」一詞早見於《周禮·夏官·司馬》：「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春官·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奎，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玄注：「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夕月」就是祭月。《禮記·祭義》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孔穎達疏：「此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禮也。」中秋原指陰曆的秋分，在八月十五日，是夕月特別亮而圓。中國以農立國，秋季是豐收的季節，因此古代社會有拜月的祭祀。據說秦始皇時已有這些活動，漢武帝曾建「俯月臺」用來賞月，魏晉六朝以後，祭月、拜月逐步演變成賞月的風俗。其時詩賦迭出，名作有晉傅玄〈明月篇〉、梁沈約〈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北魏魏收〈月下秋宴詩〉、北周王褒〈月下詠人詩〉、陳張正見〈薄帷鑒明月詩〉等。唐代帝王喜愛中秋賞月，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玄宗……八月十五夕，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又云：「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楊）貴妃臨太液池，憑欄

¹ 元末兩淮民眾起事推翻元朝的史料甚多，詳見陳高華等編輯，《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上、中、下三編。有關民間傳說資料，參考盧心銘，〈元代人民起義與民間歌謠〉，《元史論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5輯，頁313-326；又見蕭啓慶，〈蒙元興亡讖緯〉，《歷史月刊》，期92（1995年9月），頁54-60。關於「韃靼」及「韃子」一詞的源流，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民族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頁80-81；又參漢語大詞典編纂會編纂，《漢語大詞典》（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卷1，頁213。

² 中秋節的歷史文獻，詳見陳夢雷等編纂，《古今圖書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據雍正原刻影印本），《曆象彙編·歲功典》，卷71，〈中秋部彙考〉；卷72，〈中秋部藝文〉；卷73，〈中秋部紀事〉。近人關於中秋節著作，有韓養民、郭興文，《中國古代節日風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229-260；陸家驥，《中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3-9、114-119；韓廣澤、李岩齡，《中國古代詩歌與節日習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頁228-259；田哲益，《細說中秋》（臺北：百觀出版社，1994），頁13-25等。辭書有關條文，見葉大兵、王文寶等編，《中國風俗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頁17（中秋節）、頁378（月餅）；王景琳、徐甸等編，《中國民間信仰風俗辭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頁502（中秋節）。不過，楊琳於所著《中國傳統節日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頁318-328論中秋節及月餅的源流，曾縝密複查以上專書及辭典所引史料，發現甚多重疊錯誤，因此採用這些時人作品要特別小心。

望月不盡。帝意不快，遂勅左右於池西岸別築高臺，與吾妃子年年望月。」³唐朝文人隨後展開賞月活動，詩篇出現賞月的題材，逐漸成爲習俗，並且傳播到新羅，與僑民的節慶融合而光大爲節日。

到了宋代，「中秋節」一詞正式出現。根據南宋人的記載，北宋時的中秋節已相當盛行，其風俗漸漸從宮廷普及至民間。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汴京（開封）的熱鬧情況云：「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是時螯蟹新出，石榴、楸勃、梨、棗、栗、芋羅……皆新上市。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翫月。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外。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驢闌，至於通曉。」吳自牧《夢粱錄》又記：「此夜月色，倍明於常時。……此際金風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翫月。或登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歡。……至於鋪席之家，亦登小月臺，安排家宴。……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懽，不肯虛度此夜。……」想見其盛況。⁴中秋節應景的食品、糕餅、果類不勝其數，糕餅有月餅的專稱，《東京夢華錄》及周密《武林舊事》等書都有細緻的記載。

關於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唐代君臣吃餅已成一種逸興，餅有多種名稱和類別，但未見「月餅」之名。到了宋代，賞月吃餅之風大盛，文人詩篇不乏記載。蘇軾（東坡）〈留別廉守〉詩說：「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顯然是描述月餅。根據《武林舊事》載時下流行〈蒸作從食〉的糕餅，已有「荷葉」、「牡丹花」、「芙蓉」各類花樣，其中還有「月餅」一目，但未

³ 引文見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56，頁 2322；卷 39，頁 1574。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46，頁 1217。陳夢雷等編纂，《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歲功典》，卷 73，〈中秋部外編〉，頁 1 下。逸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冊上，頁 558；冊中，頁 1645；冊下，頁 2270、2340、2493。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所收〈開元天寶遺事〉，頁 84、105。

⁴ 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卷 8，頁 222；吳自牧，《夢粱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卷 4，頁 25。

詳內涵。元代的蒙古皇帝亦沾上中秋風俗，根據陶宗儀《元氏掖庭記》，武宗曾於正大二年(1309)中秋節在宮中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延續漢人中秋賞月的風俗。⁵明清的中秋節活動更盛大和多姿多采，吃月餅之風更遍及民間。如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載：「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沈榜《宛署雜記·民風》〈八月饋月餅〉注云：「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麵餅相遺，大小不等，呼爲月餅。市肆至以果爲餡，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清代京師的月餅更是千妍百態，琳瑯滿目。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月餅》記：「至供月月餅到處皆有，大者尺餘，上繪月宮蟾兔之形。有祭畢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謂之團圓餅。」⁶其他有關中秋的詩詞不勝枚舉，但大都談詠佳節的賞心悅事。

但在民國以後，人們一到中秋節，談起吃月餅的風俗掌故，都不期然會提到元朝末年漢人起義，「八月十五殺韃子」，推翻蒙古政權的傳說故事。這些故事開始是以口碑傳述，後來記於文字，在流傳中又增減或改動內容，因此有幾個反映不同時代或不同源頭的版本。根據主流的說法，元末江淮的老百姓忍受不住蒙古統治者虐政，秘密商議在月餅餡中夾藏中秋夕起義的通知，到了八月十五中秋佳節之夜，家家戶戶掰開月餅，看見紙條，便一同起來持兵器殺害身邊的蒙古人，由是傾覆了元朝，恢復漢人的統治。許多不同版本的故事都說這是出於明朝開國功臣劉基的策劃。劉基(1311-1375)，字伯溫，浙江青田縣人，明太祖（1368-1398 在位）的帷幄輔佐，機密軍師，學富五車，精於謀略兵法，元末征戰群雄時，隨軍定策決計，屢建奇功。太祖登基後，官拜御史中丞，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未幾，告老還鄉病卒，

⁵ 資料引文見陳夢雷等編纂，《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卷 267，〈餅部紀事〉，頁 4 下-6 上；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43，頁 2373；周密，《武林舊事》，收入丁丙輯，《武林掌故叢書》（光緒九年[1883]刊本），卷 6，頁 10 上-10 下；陶宗儀，《元氏掖庭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頁 25。

⁶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20，頁 361；沈榜，《宛署雜記》（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卷 17（上字），頁 168；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頁 78-79。

譽爲一代大儒、佐命名臣。但在民間傳說裡，他以其字伯溫知名，是一位通曉天文曆算、逆知未來的占卜星象家，撰作不少陰陽術數奇書，並且遺下〈燒餅歌〉讖書，預言滿清滅亡的神秘傳奇人物，坊間還流傳他畫圖建造北京「八臂哪吒城」。⁷從清末到民國，在熾烈的反滿情緒影響下，這個以劉伯溫爲中心的元朝末年漢人起義故事，很受到漢民族的歡迎，並信以爲真，且在每年慶祝中秋節時大張其事。不過，這些膾炙人口的故事並不是漢人獨有，在蒙古族的傳說亦流露出來，而且早有蒙文鈔本傳播。二者所反映的是同一歷史事件，但內容有歧異，各自展現獨特的傳統，亦顯示漢、蒙兩族民間文化的交流，有特別的意義。以下先將漢人和蒙古流傳的故事作一介紹，比較二者異同，然後從不同角度，探索劉伯溫「八月十五殺鞑子」故事的形成及其影響。⁸

二

元明之際的私史雜著，如權衡《庚申外史》、陶宗儀《輟耕錄》、葉子奇《草木子》，及明初官修的《元史》等，都不乏有關民間讖謠或反元宣傳，隱喻蒙古政權的滅亡。最早的記載出現於世祖忽必烈汗（1260-1294 在位）至

⁷ 劉基(伯溫)的傳記，詳見張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28，頁3777-3782；雷銑、王棻修纂，光緒《青田縣志》（光緒二年[1876]序刊），卷10，頁3上-6下。其他傳記，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6），冊上，頁842-843。近人著述，見王馨一，《劉伯溫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參郝兆矩，《增訂劉伯溫年譜》〔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劉德隅，《明劉伯溫公生平事蹟拾遺》（臺北：自印本，1976）；Hok-lam Chan, "Liu Chi," in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a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1, pp. 932-938；及郝兆矩、劉文峰，《劉伯溫全傳》（大連：大連出版社，1994）。關於劉基的神化過程及其傳說的發展，詳見註38。

⁸ 筆者年前曾以英文撰述論文探索這一課題，見 Hok-lam Chan, "The Demise of Yuan Rule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Legends," in *Altaic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Budapest, June 24-29, 1990), eds. Geza Bethlenfalvy and Alice Sarkozi et al. (Budapest, 1992), pp. 65-82. 此文收入氏著, *China and the Mongols: History and Legend under the Yuan and Ming*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Co., 1999), Part V.

元十三年(1276)，是時漢民初附，各地盜賊蠱起。《輟耕錄》云：「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鈔刻於梓、黃紙模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真武即真武帝君，為道教威振北方之神。很明顯，這是江南漢民假借「真武降筆」之名，編印讖謠式的傳單，表達對蒙古統治的不滿，並祈望其趕快衰亡。⁹元末最著名的民間抗蒙讖謠，莫如白蓮教首領韓山童(?-1355)等在黃河河道的黃陵崗，預埋一眼石人，散佈天下民間造反的〈石人謠〉。《草木子》載元朝末帝（明太祖諡為順帝）妥懽帖睦爾（1333-1370 在位）至正十一年(1351)，工部尚書賈魯開治黃河河道使北流，「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給，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為驚詫而謀亂。」這個讖謠又見於《庚申外史》、《元史》及其他後出載籍，流傳廣遠，學者論述這時期的漢人反抗蒙古活動，大多標舉這一事件。¹⁰但是，近代流傳的許多元末漢人起義抗蒙故事，特別是膾炙人口的劉伯溫「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不獨不見於當時史志，下至明清載籍亦未見記載。這些故事來歷不明，大概到清末始從坊間以口傳民謠流出，作為不同地區集體歷史記憶的折射，由民間文藝家記錄下來，各有細節差異的版本。謹按其在二十世紀出現時序，摘錄八個比較顯著的不同類型的故事，和另一個以劉伯溫為中心較長篇的〈中秋月餅〉傳說故事以作說明。

第一至第八的故事比較簡短，代表幾個不同時代和地點對傳聞的反覆縷述：

⁹ 陶宗儀，《輟耕錄》（臺北：世界書局，1963），卷 26，〈武當山降筆〉，頁 400。

¹⁰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 上，〈克謹篇〉，頁 50-51；權衡著，任崇岳箋，《庚申外史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 69。宋濂等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51，〈五行志 2〉，頁 1107；卷 66，〈河渠志 3〉，頁 1654。其他民間抗元讖謠，詳見註 1 揭盧心銘及蕭啓慶之論文。

一、佚名，《野客叢讀》：

元末宋室遺老（按：此宋室應指韓林兒所建立以龍鳳為紀年的宋國）劉伯溫等，某年中秋之前，遍佈流言，謂中秋夕食月餅可免瘟疫。此計既售，乃聯絡漢人，預約於八月十五之夕，豎花燈為信號，並分頭製造月餅以供所需。每一餅餡中，皆預置一文告相約，曰：「大除夕殺韃子！」而胡奴不識漢字，猶在鼓中，懵然不覺。經四閱月之醞釀，大部成熟，至除夕之夜饗韃子以歲除酒食，乘其酒醉而殺之，元朝卒告滅亡。由是中秋月餅風俗遍及全國，故明太祖以為開國紀念，如角黍之紀念屈原。¹¹

二、佚名，《浪跡叢談》：

元末宋室遺老，某年中秋之前，遍佈謠言，謂中秋節食月餅可免瘟疫。此計既售，有志之士，乃連絡全國城鎮，分頭製造月餅，每一餅餡之中，皆預置一文相約曰：「大除夕殺韃子！」經四月之醞釀，元朝卒告滅亡，故明太祖以月餅為開國紀念，由是中秋月餅風俗普及全國。¹²

三、尚秉和，〈明清時之端陽中秋〉，《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

野史：元至正二十六年夏，即有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謠。至中秋夜，果數省同時起事，各縣蒙古人是夜均被戕，蓋中秋人民無不夜飲，飲既醉，乘酒興為之。又按元時各縣，皆設蒙官，肆虐於民。至今父老，有十家養一韃的傳說，平日敢怒不敢言。至中秋人民乘酒醉之餘，不約而同，同時起事，是可證自明初以來，人民中秋夜飲讌，普遍全國。¹³

首則故事稱出自《野客叢讀》，但其書及作者無考，而第二則亦來歷不

¹¹ 見王世禎，《中國節令習俗》（臺北：星光出版社，1981），頁206-207；轉引於白福臻，《月餅漫考》（上）（下），刊於《明報·副刊》，1985年9月22、23日，頁6。作者並未署名資料來源。

¹² 轉載自田哲益，《細說中秋》，頁154-155。田書引自《浪跡叢談》。梁章鉅(1775-1849)雖著有《浪跡叢談》，惟遍查全書，不見此一記載。見梁章鉅撰，陳鐵民點校，《浪跡叢談·續談·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

¹³ 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卷39，頁445-446。

明，然比較其文字詞語，顯然係前著彙錄。至於第三則記載，無疑更後出，係追溯前事之作，其言野史所云，直是道聽塗說。不過從引文的文體及出版年代考察，這三則記載都應該早於 1930 年代，由於使用淺白的古漢語描述，反映其流傳時間可能更早，甚至在清末即已出現。當時漢民族中排拒外族的意識很強，殺「韃子」之謠可能就是這個時代的產品。第一、二則故事未說明確切年代，但強調劉伯溫是主謀，在元末某年預言謂中秋節食月餅可免瘟疫，聯絡漢人於八月十五之夕豎花燈為信號，並在製造月餅時在餅餡中預置一文，相約「大除夕殺韃子！」到時舉事果然成功如期。第三則故事指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3)夏，即有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謠，到中秋夜，數省果然同時起事，各縣的蒙古人是夜都被殺害。故事沒有說誰為主謀，但指出元時各縣蒙官皆肆虐於民，坊間有「十家養一韃」的傳說，民眾平日敢怒不敢言，因此至中秋夕乘官吏酒醉之餘，不約而同採取行動。這裡提出的「十家養一韃」的傳說有歷史根據，後出的「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不少都把它包括在內，作為漢人仇恨蒙古人統治的依據，而此後講中秋節吃月餅習俗的來歷，也自然與這個偉大革命故事連接一起。

四、黃紹年，〈中秋節翁源的風俗及傳說〉：

送餅的起源，是在元末明初的時候。當時朱洪武屢被元兵打敗，洪武向軍師劉伯溫請計，想了許久，便想了一個非軍事上的法子來。那時是七月初旬，他叫了許多人，扮著道士，分向各州各縣去賣符。並揚言說，今年天降大災，欲避的，必須於八月十五掛他所畫的旗樣的旗，才可免去。但此事想傳播親友，口述是無效，必要寫明夾在餅內送去才可。如是爭先恐後，家家都真的照辦起來，到了那天各人的門上都插上一面旗子，元兵一見，大驚失色，因此就敗了。原來，這旗子就是明旗，所說口述無效的，就是怕為元人知道呢。元人敗了，朱洪武做了皇帝，自然對於這件有功的事，獎令舉行了。就此傳到如今，成為風俗。¹⁴

¹⁴ 黃紹年，〈中秋節翁源的風俗及傳說〉，《民俗》，期 32(1928 年 10 月)(中秋專號)，頁 34-35。

這則故事是民國 17 年(1928)廣東的民俗學者載錄，主要說朱元璋問計於劉伯溫，如何可以擊敗元朝的兵，伯溫於是在七月初旬，扮著道士向各州縣去賣符，並揚言不久天降大災，必須於八月十五掛上他所畫的旗才可以避免。他想將此事傳播親友，但恐口述無效，於是把訊息寫明夾在月餅內送出去，到了中秋節那天各人看到指示，於是都在自己門上插上一面旗子。原來這旗子是明旗，元兵一見，大驚失色，因此就被打敗。這個故事傳自廣東翁源，內容與一般流傳元末漢人中秋節殺韃子的故事不同，不過同樣提到劉伯溫的謀略，利用月餅傳達在八月十五採取行動的指示，因此也應該歸類於此。

五、婁子匡，〈月餅傳說〉，《歲時漫談》：

中秋月餅在俗文學中，有一個驚人的故事——中原漢族反抗蒙古人的傳說。……元朝初年，中原漢族人民，不甘蒙古人的專制統治，由一批宋代遺臣密謀恢復宋室江山。為了聯絡各省革命志士和發動一致的革命行動，決定同一天分頭起義，和起義的指示，寫在紙面上，在做中秋月餅的時候，就把這張紙密藏在月餅的餡子，一起饋送月餅給志同道合的人，這是元朝官吏不會知道內有陰謀的。接受月餅的漢族人民把餅割開來吃的時候，發現這張紙條，看了紙條的字跡，就知道大家同時起義的時刻是中秋這天，有明白起義時候應注意的要點，於是全國各地漢族人民舉起義旗，同時行動，把蒙古人趕出他們的家鄉，一次驚人的大革命，爆發在中秋，漢族義師獲得了勝利！¹⁵

這則故事代表 1949 年中國大陸政局劇變，原內地一位著名民俗學者遷居臺灣後，追述中原傳統的作品，用語體文書寫，內容仍以月餅傳說為主，但沒有指出劉伯溫策劃謀略。雖然提到漢人不甘蒙古專制統治，並無具體談及外族統治壓迫的情形，重點在他們利用月餅的餡子傳達訊息，集體起義革命，把蒙古人趕出他們的家鄉，恢復大漢的江山。從政治意理而言，與前三則故事所表現的很相近。

¹⁵ 婁子匡，《歲時漫談》（臺北：文星書店，1967），頁 161-162。

六、黃葉，〈八月十五吃月餅的來歷〉：

傳說元朝蒙古貴族統治中國的時候，對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進行著殘酷的民族鎮壓，並且把漢族看作是最卑賤的奴隸，每個漢人家裡都住一個蒙古兵，以監視漢人。人們稱這個蒙古兵為「家韃子」。他們無惡不作，百般欺壓漢人，不允許漢人有任何自由。百姓十分仇視蒙古統治者和「家韃子」。可這是不能走漏半點風聲的大事，怎麼暗自串聯呢？有個聰明人想到了一個辦法，在賣的麵餅裡夾上一個紙條，號召人們八月十五這天一起動手殺韃子。讓人們買餅吃時看見這個紙條。這辦法果然不錯，把號召起義的消息傳遍四面八方，許多得到消息的人家都按時動手殺了韃子。此事釀成了農民起義，終於推翻了蒙古統治者。後來，人們便在八月十五這天吃月餅表示紀念。¹⁶

七、馬宏智，《年節趣話》：

中秋節吃月餅的風俗，流傳更廣。據說元朝的統治者，統治了中國以後，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十家只許用一把切菜刀。每十家還要供養一個蒙古奴隸主的爪牙。這些爪牙，胡作非為，無惡不作。到了元朝末年，各地災荒嚴重，農民顛沛流離，忍飢受餓，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社會秩序也相當混亂。有一年的中秋節前，泰州張士誠暗中串聯，把寫著「殺韃子，滅元朝；八月十五，家家齊動手」；「月光亮亮，齊齊排排，排到明朝好世界」等推翻元朝的字條，藏在月餅裡互相傳送，互相聯絡。到了中秋的晚上，家家吃月餅，舉行了民族大起義，把元蒙的統治者推翻了。¹⁷

八、張紫晨，《中國古代傳說》：

在民間傳說裡，月餅的來歷與反抗元朝統治有關，也凝結著中秋節的

¹⁶ 黃泊滄，《節日的傳說》（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 51。這個故事係由黃葉蒐集。

¹⁷ 馬宏智，《年節趣話》（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 94-95。此故事又見羅啓榮、歐仁煊，《中國年節》（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3），頁 103-104；韓養民、郭興文，《中國古代節日風俗》，頁 254-255。

風俗。一般中秋節為吃月餅的季節，為什麼中秋節要吃月餅？傳說的解釋是在元朝末年，元朝統治者對人民的統治十分殘酷，為了監視人民的反抗，把十家老百姓聯在一起，十家只能用一把菜刀，還要十家供養一個士兵。誰家姑娘出嫁，第一夜必須送給他們過夜。人民痛苦不堪，他們憤怒了，要求反抗，便湊在一起謀劃對付的辦法，於是便拿麵粉做成圓圓的月餅，在其中夾上一個紙條，紙條上約定了在八月十五日這天，大家一起行動去殺元朝統治者。做好以後，便當做禮物，互相傳遞贈送。到了八月十五日這天，大家吃了月餅，都看到了造反的紙條，於是一齊行動，揭竿而起，把元朝的統治者打敗了。從此以後，每到八月十五就吃月餅。這個傳說描繪了人民的苦難和機智，勇敢的鬥爭，揭露了元朝統治者的殘酷和滅絕人性的行為。它深刻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現實和人民的鬥爭情緒，但又集中解釋了中秋節吃月餅的來歷。¹⁸

這三則故事是大陸 1980 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的民俗作品，雖然仍然強調民族與統治階級間的鬥爭，內容彼此略有異同，但與前三則比較，則明顯見到不同時代的政治意理對文藝創作的影響。第一則故事比較簡單，敘述蒙古統治者虐政之一是，每家漢人都住著一個蒙古兵，去監視和壓迫他們，人們稱這個蒙古兵為「家韃子」，與其他的故事不同，是個偏例。這裡用「韃子」一詞稱呼蒙古兵，保存著舊社會蔑稱北方民族的殘餘，在強調民族平等的時代已不多見。其餘有關漢人利用麵餅夾上字條傳訊，在八月十五一同起義殺害蒙古人的情節，與其他故事雷同，但沒有道出策劃者的姓名，只以「聰明人」一詞交代。第二和第三則故事都講述元朝統治者規定漢人十家合用一把菜刀，十家還要供養一個士兵，引起民眾的仇恨，大家於是把起義造反的字條藏在月餅的餡子裡，到中秋晚上掰開月餅賀節看到暗號，便用菜刀把蒙古人殺掉。從此，人們慶祝中秋節就要吃月餅，以紀念這一節日。二則記事最

¹⁸ 張紫農，《中國古代傳說》（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 238-239。

突出的差異，是第一個故事說主事人是泰州張士誠，這便是與朱元璋爭霸的吳王張九四，不是傳統所講的劉伯溫，故事的文本顯然是從泰州那邊傳出。另一個故事列出元朝統治者對人民更多的壓迫，他們把十家老百姓聯在一起，姑娘出嫁第一夜必須送給統治者過夜（後者出自蒙古人所傳習俗，詳後）。這則故事並未講出誰主謀用月餅傳訊造反，又無提到元朝的統治者是蒙古人，顯然刻意淡化兩個民族在歷史上的矛盾，以便配合當前政府安撫少數民族的政策。

以下是 1980 年代的浙江學者所採集，一個以劉伯溫的傳說為中心集大成的「中秋月餅」故事。此見吳孟前、楊秉正選編，《劉伯溫的傳說》：

元朝皇帝一統天下以後，生怕漢人起來造反，管得可嚴哩！他們把二十戶漢人編成一閭，派蒙古人當閭長。三戶人家只給一把菜刀，還不許五人以上聚集議論。那閭長的生活都由二十戶老百姓負擔，吃的是魚肉，穿的是綢緞，住的是好房子，出門要騎馬坐轎。如果侍候稍不週到，他們要打就打，要殺就殺。大家恨之入骨，都叫他們「管家公」。朱元璋率領的農民軍攻下金華、處州和溫州等府城以後，附近縣份的黎民百姓，紛紛前來訴苦，要求早日除掉「管家公」。朱元璋想派兵清除，就跟軍師劉伯溫商量。劉伯溫思忖了一會，說：「大敵當前，中原未平，再加群雄割據，各爭地盤，主公分兵出去，只恐力量分散，難以奏效。如今伯溫可以不用一兵一卒，不出十天，保管除掉這三郡的『管家公』。」朱元璋想看看劉伯溫有什麼計策，不去動問，只暗中差人察看軍師動靜。那些人回報說，軍師每天一早只帶幾個幕友出營，不曉得做什麼去了。

中秋節晚上，皓月當空，軍營裡擺起了酒筵，將領和士兵們飲酒賞月，可歡樂啦！大家齊向都元帥敬酒，忽聽轅門口通報：「軍師到！」朱元璋起身接進劉伯溫，就開口問：「軍師幾日不見，清除『管家公』的妙計到底什麼時候可實現？」劉伯溫故意笑笑說：「區區小事，何

須主公操心！今日巧逢中秋，我們還是一同暢飲吧！」

酒過三巡，朱元璋又想動問。劉伯溫卻邀他月下對奕。朱元璋哪有心思下棋，連輸兩局，又扯扯劉伯溫衣袖說：「軍師，那件事，我們何不到後營去商量商量。」劉伯溫微笑說：「早哩！現在才子夜，等過了卯時吧。」朱元璋心不在焉，一邊著棋，一邊側耳注意更鼓聲。他始終揣測不出軍師的悶葫蘆裡到底賣的是什麼藥。正納悶，忽見東路探子來報：「『管家公』殺光了！」朱元璋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正要發問，偏偏西路、南路、北路的飛馬也接踵而至，都說「管家公」被殺得一個不剩了。朱元璋又驚又喜，只聽得掌時官來報：已是卯時一刻。朱元璋恍然大悟：「軍師說『過了卯時』，卻是這麼一回事啊！」原來，劉伯溫想到漢族人中秋賞月的風俗習慣，早在七天前，就派人分別到三郡各縣去，悄悄地關照所有糕餅店，定造幾百萬只月餅，叫他們在餅餡中放進一張紙條兒。又叫各縣內線傳話給老百姓，中秋夜晚賞月，每人吃一隻月餅，就可以消災避禍。中秋節晚上，老百姓掰開月餅，突然發現一張紙條兒，上面寫著二十個字：「神明在暗中，助民解冰凍；趁此子夜時，齊殺『管家公』。」老百姓看了，開始很是驚訝，便悄悄地走家串戶探聽消息，才知道家家戶戶都有這麼張紙條兒。這一下，大家對『管家公』的滿腔憤怒好像火山一般爆發出來，紛紛拿起菜刀、柴刀行動起來。一夜之間，那些「管家公」竟被殺得一個不留。

從那時候起，中秋賞月吃月餅，月餅底下都墊著一張紙，就成了浙江東南部的風俗習慣。¹⁹

這一則故事將蒙古要漢人「十家合用一把刀」和「二十戶人口編為一閭，派蒙古人當閭長」的傳聞聯綴起來，作為民眾反抗專制統治的理由，並將他

¹⁹ 吳孟前、楊秉正選編，《劉伯溫的傳說》（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頁61-63。按：這個傳說故事集係由溫州市群眾藝術館和溫州市民間文藝研究會徵集，「中秋月餅」的故事則由葉中鳴、周文鋒蒐集整理。

們的閻長塑造成一名被恨之入骨的「管家公」（代替前則的「家韃子」，避免傷害少數民族的感情）。朱元璋應民眾請求除掉「管家公」，問計於劉伯溫，伯溫想到民間慶祝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預先找人把寫著在卯時起來殺掉「管家公」的字條，藏在幾百萬只月餅的餡內，但沒有告訴朱元璋。到了中秋夕某時，朱元璋與劉伯溫在軍營酗酒作樂之際，將士來報老百姓已經造反，把「管家公」殺光，伯溫在月餅藏暗號的計策由是奏效，大家驚喜不已。這則故事基本上複述既有傳聞，不過將它放在朱元璋與劉伯溫在軍營策劃謀略的情節裡，作為劉伯溫傳說的一部份，由是加重了歷史分量和表現得更傳奇戲劇化。

歸納資料，這些膾炙人口的元末漢人起義推翻蒙古政權的傳說故事，每個細節雖略有不同，但除卻第四則是南方別傳，另有出處，總言之，係以民眾不能忍受元朝統治者以「十家養一韃」、「十家合用一把刀」和「二十戶漢人編成一閭，派蒙古人當閻長」等虐政迫害為背景（第七則故事說每家漢人都住著一個蒙古兵去監視和壓迫他們是個偏例）。大多故事都說主謀用月餅餡子藏字條策動大家造反、殺害元朝管治漢人主管的是明太祖的軍師劉伯溫（另則故事說是張士誠策劃的卻不大流行）。有些故事說預謀的時間是在中秋節之前，到中秋夕起事；有些故事則說策劃的時間在中秋節，到除夕時始起事，不過前者較為合理，因此也最為盛行。第七及以劉伯溫為中心的「中秋月餅」故事則透露傳訊字條的內容，但二者不一，看來是說故事宣傳者自己編造。由於流傳的地域範圍很廣，故事內容及文字記述的差異，與其出現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很有關係，不過無論如何，「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的類型和中心內容到今天還是維持不變。

三

這些歷歷記載的可信程度為何？又如何反映歷史的沉澱，顯示後人對這些轟轟烈烈的革命事跡的集體記憶？又如何增添枝葉，以古喻今，推廣漢人

反抗異族的宣傳？下面謹就故事的內涵及史籍的記載作一比較，考察幾個基本的問題。首先，故事描述元朝末年兩淮民眾利用月餅傳訊，策劃起義推翻蒙古政權的真實性。其次，故事陳說漢人對幾個蒙古虐政的指控，究竟有無歷史根據或文獻旁證。再其次，為何起義的時間選定在八月十五中秋節夕，有無特別的原因或前例可援？最後，若果劉伯溫並無參與策劃漢人起義，為何傳說故事附會他為中秋夕殺韃子的主謀？

首先，故事描述元朝末年兩淮民眾利用月餅餡子傳訊，策劃起義推翻蒙古政權，根本不可置信，因為一翻歷史查核，便知上述所謂「史實」完全是虛構附會，以訛傳訛。先從日期辯證。好幾個故事對起事的年份都含糊其詞，只有尙秉和的記述（第三則故事）說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夏，某地有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謠，至中秋夜，果數省同時起事。揆諸記載，順帝嗣位未久，江淮瀕海反元群雄蠭起，早在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鹽販方國珍(1319?-1374)在（浙江）台州倡亂，聚眾海上；十一年(1351)五月，白蓮教領袖韓山童與劉福通等在（安徽）穎上舉事；山童被捕後被處決，劉福通以紅巾為號，陷穎州；八月，紅巾彭瑩玉、徐壽輝(?-1360)、鄒普勝等在（湖北）蘄州起兵，十月佔領蘄水為都，徐壽輝稱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按：時人考證，徐氏國號原為「大宋」，疑明太祖史臣竄改為「天完」，以示有別於韓林兒所建之宋國。）定遠郭子興在十二年(1352)二月據濠州起兵，閏三月朱元璋始至濠隨從；十三年(1353)正月鹽販張士誠等攻下（江西）泰州，稱郝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同年十二月朱元璋獨舉義旗，在滁州起兵，當時共策進行的尙有徐達(1332-1385)、湯和(1326-1395)、費聚等。十五年(1355)二月，劉福通等迎韓山童子韓林兒(?-1367)至（安徽）亳州成立政權，國號宋，建元龍鳳，林兒稱帝，號小明王。十六年(1356)六月，朱元璋出任宋政權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到至正十九年(1359)九月，朱元璋攻陷處州後，劉基始被賞識，參與軍事策劃。是年底，徐壽輝部將陳友諒(1320-1363)，據江州（九江）為都，自稱漢王，次年(1360)弑其主，立國為大漢，年號大義。二十一年(1361)七月，

徐壽輝舊屬明教徒明玉珍(1331-1366)又在四川重慶稱隴蜀王，二十三年(1363)建立大夏政權，紀元天統。²⁰由此可見，兩淮民眾起義抗元，早在至正二十六年已開始，當時群雄割據一方，並無策劃以月餅藏字條傳訊，在中秋夜或大除夕數省同時起事，大殺韃子之舉。因此強調朱元璋領導起義，或劉伯溫策劃在月餅餡內藏文告秘密行事，發動民眾一起在慶祝佳節之夜殺害蒙古人，都是子虛烏有，出於有心人士的編造宣傳、說故事和好熱鬧的傳播，歷史事實並非如此。

其次，故事陳說漢人對幾個蒙古虐政的指控，究竟有無歷史根據或文獻旁證。首先評論「十家養一韃」和「二十戶漢人編成一閭，派蒙古人當閭長」的背景及傳聞，這兩則都是關涉元朝統治者管治漢人農村的制度和辦法。忽必烈汗在 1260 年登基開國之後，爲了鞏固蒙古對中國的統治，恢復農業生產，穩定社會秩序，在漢族儒臣的協助下，汲取前朝的經驗，特別是女真金朝的治亂興亡，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政治制度。相較於廣大的漢人族群，蒙古本族及其伴當入主中國的人數微不足道，絕不可能派遣官員到基層社會去直接管治。因此，據楊訥的研究，至元七年(1270)頒佈〈社法令〉，在農村成立的社制，便是符合實際形勢的地方行政制度。《通制條格·田令》對社的體制和內容介紹說：「諸縣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爲一社，……令社眾推舉年高、通曉農事、有兼丁者，立爲社長。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爲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設社長一員。如不及五十家者，與附近村分相併爲一社。若地遠人稀不能相併者，……各村自爲一社者聽，……仍於酌中村內選立社長。」²¹按史所記，社制先行於北方，元滅南宋後(1279)，又把它推行到江南，

²⁰ 以上有關記載，略見宋濂等纂，《元史》，卷 45-47，〈順帝紀 8-10〉，及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1，〈太祖紀 1〉；又見陳高華等編輯，《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下編）所徵引史料。關於徐壽輝所稱國號原爲「大宋」，疑明太祖史臣竄改爲「天完」，以示有別於韓林兒所建之宋國的考證，詳見劉孔伏、薛新力，〈談元末徐壽輝農民政權的年號及國號——附錄〈玄宮之碑〉碑文〉，《學術月刊》，1984 年第 5 期，頁 47-50；及章采烈，〈談〈玄宮之碑〉的史料價值〉，《江漢論壇》，1986 年第 4 期，頁 67-70 等。

²¹ 關於這個制度的研究，詳見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歷史研究》，1965 年第 4 期，頁 118-120。引文見黃時鑑點校，《通制條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 16，〈田

一直至元朝滅亡。然則傳說故事所描述元在江南推行的「十家養一韃」和「二十戶漢人編成一閭，派蒙古人當閭長」的制度是否無中生有？這又不然，似乎是虛實佔半，須要分別考析。

關於「十家養一韃」之說，《元史·陳天祥傳》有類似的記載。按：陳天祥出身漢軍軍籍，至元十三年(1276)，江西興國軍以拘收兵器致亂，天祥時為千戶，奉行省命權知本軍事。天祥撫恤民怨，凡所設施皆合眾望，由是流移復業，鄰郡之民相繼來歸，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遂安，境內悉平。²²這裡所說「以十家為甲，十甲有長」，每甲有甲主，即是前朝漢人農村的里甲制度，而甲主是漢人，並非蒙古或色目人，但這看來是當時地方應變權宜之計，雖或其他州縣有時仍有，絕不是與社制並行的制度。縱使如是，這個措施近似「十家養一韃」之說，只是甲主換上蒙古人，很可能就是史事的來源，在流傳的過程逐步演變，後來被排外的宣傳利用，糅合成為推翻蒙古政權的一個藉口。這個抗蒙的指控，又被太平天國採用，他們指責康熙皇帝（1662-1722 在位）「暗使韃子管十家」（見後），看來便是影射蒙古暴政作為反抗滿清統治的宣傳，到後來又與漢人反蒙的傳聞混雜一起。

至於「二十戶漢人編成一閭，派蒙古人當閭長」一說，亦有出處可尋。按元初遺民徐大焯在《燼餘錄》描述：「北兵之禍，殺戮無人理，甚至縛童稚於高竿，射中其竅者賭洋酒。亂後撿骨十餘萬，葬於桃隴西北周書橋，題墓碑曰『萬忠』。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盡者又不知凡幾。金芸樓室人周氏花燭之夜，甲主躐之，周以燙斗破其腦，亦自經死。芸樓懼禍，縊其旁。越三年，五月五日，聯合省郡同殲甲主。後里人收其骨，藏於『萬忠』墓右，表以石曰『義夫節婦墓』。」

令·農桑》，頁 188；及不著撰者，《元典章》（影印《大元聖政國朝元典章》）（北京：中國書店，1990），卷 23，〈勸農立社事理〉，頁 10 上-10 下。

²² 宋濂等纂，《元史》，卷 168，頁 3941-3943。

他處又說：「鼎革後，城鄉邊設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²³這是一段倖存的蒙元入侵蘇州暴行的記載。

據《燼餘錄》書前李模序言，徐大焯號城北遺民，元初居吳縣桃隴慶雲里，元兵入蘇州時，他應是事變的目擊者。蒙古兵殺戮當地民眾，蹂躪童男女，草菅人命或為事實，然所謂「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是否屬實，仍有疑問。此說僅見於《燼餘錄》，鄭思肖（1206-1283，另說1241-1318）《心史》這樣的書都沒有提到。楊訥研究元代農村制度，引用過許多史料，證明江南地區曾實行過社制。即使《燼餘錄》所述屬實，恐怕也只是元兵剛入吳縣時一度在當地施行的制度，實施範圍既不會越出吳縣一帶，實施時間亦不長。後來吳縣一帶實行的是里正、主首這套制度，把甲制當做元代江南的基層制度是錯誤的。²⁴再者，《燼餘錄》一書遲至光緒年間始由《望炊樓叢書》編者第一次付印，作序言的李模曾在南明為官，入清後民族意識很強，自謂《燼餘錄》係錄自徐大焯後裔徐紹齋家，「冀備修志之用，豈料投忌，尚須秘藏」，又以「後裔遷居」來說明徐大焯此書在明代未曾付梓的原因。這一來，《燼餘錄》所說蒙古族「鼎革後」統治中原，「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的真實性誠有疑問。不過，無論真實與否，對編造漢民族反抗蒙古統治的故事而言，這件事情無疑提供最合適的歷史資料。²⁵

關於「十家合用一把刀」的指控，又是附會蒙古政權統治漢人的另一虐政。根據《元史》、《通制條格》和《元典章》的記載，從忽必烈汗中統三年(1262)敕平李璫叛亂以來，朝廷即有「禁民間私藏軍器」之令，事後連年三令五申，可見執行之嚴厲。至元十三年(1276)，大軍陷臨安，宋降，又「括江南已附州郡軍器」，以後陸續禁止漢人及南人執把弓箭和其他兵器，越趨嚴苛（按：漢人指淮河以北原金國境內的漢族；南人指原南宋境內的漢族及其

²³ 見徐大焯，《燼餘錄》乙編，收入李模編，《望炊樓叢書》（蘇州文學山房據光緒中原刊本彙印，1924），頁26上-26下、頁29上。

²⁴ 見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歷史研究》，1965年第4期，頁119-120。

²⁵ 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歷史研究》，1965年第4期，頁120，註4。

他各族)。至元二十二年(1285)，令將漢地、江南拘收的弓箭、兵器分爲三等：下等銷燬，中等賜給近居蒙古人，上等存庫。兵器由所在行省、行院、行臺掌管；無官署的，由達魯赤花或畏兀、回回人任職者掌管。漢人、南人雖居職，但不得掌兵器。繼規定各路府州縣捕盜應備的弓箭數量，仍命由當地蒙古、色目官員掌管。新附軍的兵器，平時皆存放庫中，有事時臨時關撥，一旦軍事停止，仍歸庫存放，不得繼續持有。至元二十三年(1286)，又「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過及杖之藏刃者，悉輸於官」，持彈弓射鳥鵲亦所不許。元政府甚至禁止漢人、南人蓄鷹、犬爲獵，違者沒入家資。後至元三年(1337)，丞相伯顏當國，爲防止南人造反，又重申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此外，對漢人、南人祈神賽社、習學槍榜武術，以至演唱戲文、評話等，都橫加禁止或限制，以防他們聚眾鬧事。由此可見，蒙古統治者爲防範漢族造反，無所不用其極。「十家合用一把刀」這個不可理喻的苛制未見記載，大概是子虛之說，誇大蒙古政權嚴厲禁止漢人及南人持有兵器的虐政。²⁶

然則起義的日子，爲何要選定在八月十五中秋節夕，有無特別的原因或先例可援？雖然少數記載，例如前揭《燼餘錄》說里人在五月五日聯合省郡同殲甲主，當天是紀念屈原的端午節，起義者大概借此慶祝節日的機會，一同採取行動。但是大多故事都說民眾在八月十五起義，主謀者在月餅餡中藏字條，約定在中秋夕一同採取行動。不過，除卻藉中秋節吃月餅爲起事提供上好機會以外，在是日起義反抗政府，又有其他的歷史事例。在明中葉以後，閏八月十五日被一些民間宗教信仰者認爲是三元劫運之日，即是變天的日子，故此在明清時期這一日發生的動亂特多，對民間傳說的發展有特別意義。

²⁶ 引文見宋濂等纂，《元史》，卷5，〈世祖紀2〉，頁83；卷9，〈世祖紀6〉，頁180；卷13，〈世祖紀10〉，頁276；卷14，〈世祖紀11〉，頁286；卷15，〈世祖紀12〉，頁256；卷16，〈世祖紀13〉，頁339；卷39，〈順帝紀2〉，頁839、853、855。不著撰者，《元典章》，卷3，〈聖政2〉，頁20下；卷38，〈兵部5〉，頁5下；卷57，〈刑部19〉，頁45下、50上-50下、53上。黃時鑑點校，《通制條格》，卷28，〈擾民〉，頁300；〈祈賽等事〉，頁305。詳見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8），頁56-60。

簡約來說，在唐宋佛教宣傳干支「末劫年」思想的影響下，明清兩代民間秘密宗教開始宣傳閏八月宗教的末劫論。根據官方頒發的曆書，從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到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百八十年間共經歷十個陰曆閏八月。這十次閏八月的年代裡，在明代有大動亂的只有兩次，但是清代自文宗咸豐元年(1851)到德宗光緒二十六年，連續三次閏八月都有變天的大動亂。例如，咸豐元年辛亥，太平天國洪秀全稱王；穆宗同治元年壬戌(1862)，上海成立常勝軍；及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慈禧太后、光緒皇帝西狩。據民間流傳的曆書，這些年間還多一個閏八月，那便是仁宗嘉慶十八年(1813)，歲次癸酉，但這次閏月並不見於官方的時憲書。因為嘉慶十六年(1811)慧星見於西北方，欽天監以天象主兵，奏請更改時憲書，取消閏八月，改於嘉慶十九年(1814)二月置閏。不過，民間仍然沿用舊曆書，流傳閏八月對清朝政權不利的歌謠。其中康熙年間崛起的八卦教，更極力宣傳閏八月為紅陽末劫的思想，天上換盤，是變天的年代，意味滿清政權即將結束。

八卦教是清中葉一個重要民間秘密教派，教中組織按照地理方位，分為八卦，每卦設一卦長，各掌一教。嘉慶年間，由林清總管八卦，被稱為當家。八卦教又稱白陽教，後來改稱天理教。對八卦教而言，「八」是一個很神秘的數目，八的倍數可以推演更多的變化，八乘以八，演為六十四，閏八月對八卦教而言，是有特殊的意義。八卦教〈天書〉內就記載著「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黃花滿地開放」的讖語。句中第二個中秋，就是閏八月中秋，相當於新頒時憲書中的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林清等人推算天書，算出這一年閏八月十五日，是紅陽末劫，白陽教應興，彌勒降生，於是極力宣傳這是變天的時機，暗中聯絡各卦教主，準備起事應劫。經過幾個月籌謀，林清等人果於九月十五日，即是第二個中秋閏八月十五日，率眾在北京起事，闖進紫禁城，計畫趁嘉慶皇帝回鑾時刺駕，但因各路未能如期配合，遂告戮。雖然如此，閏八月十五日在民間產生很大的迴響，認為是紅陽末劫、彌勒降生應

驗的日子，人們迷信是日都會遇到變亂。按此推理，清末流行的元末劉伯溫「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很可能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²⁷下面先考察清末出現的蒙古傳說故事所反映的元末漢人起義事情，然後探索為何民間附會劉伯溫為中秋節殺韃子的主謀的問題。

四

關於元末漢人起義推翻蒙古統治的事情，在清末流傳的蒙古本族的傳說故事亦反映出來，這故事不是單獨出現的，而是在蒙古地區流傳的一個有關明朝成祖永樂皇帝朱棣（1360-1424；1402-1424 在位）的駭俗傳說的一部份。據說自從十七世紀開始，蒙古族人相傳永樂皇帝並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骨肉，而是元朝末帝妥懽帖睦爾小皇后的兒子。這個故事首見於蒙古後期的史冊，如《蒙古黃金史綱》(*Altan Tobchi*)、《蒙古黃金史》(*Altan Tobchi Nova*)，和後出的《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chi*)等。各家不約而同地說，當朱元璋的軍隊攻破大都城時，俘虜了妥懽帖睦爾的寵后弘吉刺哈屯，見她姿色美艷，特別垂青，由是納入後宮。這時妃已有娠數月，但不肯告白，懼怕受害，惟默禱於天，延遲產期，免起疑竇，果然懷孕十三月始生一男（是為太子），主上甚為喜悅。有言太祖雖疑所生並非骨肉，仍鍾愛如己出；但又有說其鑑於大臣蜚語，恐怕太子受害，於是遣人開府北平，鎮守邊疆以防蒙古入寇。²⁸ 這個故事後來又在一些口碑文學輾轉傳述，增添神奇怪異的情節，在長城內

²⁷ 關於八卦教首領林清京師叛亂事件，略見喻松青，《明清白蓮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4篇；馬西沙，《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第2、4、6章；又參見莊吉發，〈閏八月——民間秘密宗教的末劫預言〉，《歷史月刊》，期92（1995年9月），頁61-65；及鄭志明，〈「末劫預言」與「卯劫觀音」〉，《歷史月刊》，期92（1995年9月），頁65-69。

²⁸ 此故事見羅布桑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著，《蒙古黃金史譯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186；羅桑丹津著，色道爾吉譯，《蒙古黃金史》（呼和浩特：蒙古學出版社，1993），頁308-309；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頁46；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新譯校注〕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卷8，頁464。

外的蒙漢社會甚為流行。朱棣是否為元順帝的遺子，何故產生如此荒誕的傳說，其生母究竟為蒙古人或漢人，1930年代學者，如傅斯年、李晉華、吳晗、邵循正等，已有讜論。一般認為，永樂帝並非太祖馬皇后(1332-1382)所出，《明太祖實錄》所載係據竄改〈玉牒〉，旨在膺合朱棣起兵「靖難」，建文帝朱允炆(1398-1402在位)於南京宮內自焚，由是登基繼統的藉口。根據〈祖訓〉條文，正后嫡子方能嗣位。實則朱棣生母為太祖之碩妃，系出蒙古弘(洪)吉刺部，「碩」係部名 Qonggirad 或 Khungirat 對音漢譯之首字，其名不詳，但並不是妥懽帖睦爾的寵后。這個流言縱係子虛無稽，但對蒙古族有特殊的意義，意即元廷雖亡，但當今明朝皇帝實係蒙古族遺裔，因此並未絕統。也許是一種補償心理的表現，所以流傳不絕。²⁹

這個故事有文獻傳鈔和口述紀錄兩種不同版本，都是已故比利時天主教聖母聖心會的蒙古史專家田清波司鐸(Fr. Antoine Mostaert, C. I. C. M.)，於十九世紀初期在內蒙古伊克昭盟鄂爾多斯(Ordos)地區傳教蒐集到的資料。文獻本指1907年鈔錄的手稿，一共有兩件。標題的蒙文音寫是 *Dayiming yuwa lowa gaghan bezejing gata-(n)i bayighulughsan uliger-un debtor* (漢譯擬為〈大明永樂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小標題是 *yuwa(n)tayise* (元太子)、*jingtayise* (真太子)。所謂「元太子」指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永樂帝；「真太子」影射建文帝朱允炆，本是明太祖嫡長子朱標(1355-1392)之子，是太祖嫡孫，不是他的兒子，蒙古傳說在此故意調亂。這個故事的口述筆錄收入田清波司鐸

²⁹ 詳見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記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4分(1932)，頁406-414；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並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1分(1936年3月)，頁79-86；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記疑辯〉，《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卷2期1(1933)，頁1-13；朱希祖，〈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碩妃說〉，《東方雜誌》，卷33期12(1936)，頁5-19；吳晗，〈明成祖生母考〉，《清華學報》，卷10期3(1935年7月)，頁631-646；李晉華，〈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皆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1分，頁45-53、55-77等。又見J. S. Shaw(邵循正)，"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ious Theory of the Mongol Blood in the Ve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20:4(1937), pp. 492-498；及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刺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頁1-18。

編錄的《鄂爾多斯地區口碑文學集》(*Textes oraux ordos*)，法文翻譯則收入所編《鄂爾多斯地區的民俗集成》(*Folklore ordos*)，內容與文獻鈔本有出入，代表蒙文文字與口語表達的歧異，但是情節亦有增飾，宜作比較研究。³⁰

田清波的文獻傳鈔本於 1970 年代由同教會的蒙古史專家司律義司鐸(Fr. Henry Serruys)整理研究，並將之作拉丁音寫及翻譯為英文。³¹由於這個長篇以漢人在（閏）八月十五日中秋夕起義殺害蒙古人的故事為起首，謹將文獻本及口述本有關情節逐譯作為討論，其他部份與本篇論旨無關則從略。文獻本田司鐸的英譯描述漢人起義的經過如下：

我們偉大的祖先，聖福的耆老成吉思汗，以天縱無比的威力，將許多部落和省份轄置於他的統治，建立了大元王朝，世世代代繼承，一共有十三位大汗在位。到了末期，在妥懽帖睦爾的時代，每十個漢人的家庭都安插著一位喇嘛，把他們當作奴隸般統治。這些喇嘛不但蹂躪男童，而每當女孩要出嫁，他們先把她帶走加以侵犯，說是去取她的初夜權。漢人對他們這可恥和淫褻的壓迫都感到很傷痛，於是在妥懽帖睦爾在位的四十二年（按：這個年份是錯誤的，因為大汗即位至元亡僅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密議，在同一時刻去殺掉管治他們的喇嘛，然後推翻蒙古的政權。他們雖然有了協議，但到那一天仍未準備好，於是決定改在同年閏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當月亮一升起，大家便去殺管治他們的喇嘛，把他們的頭顱和肝臟拿去祭月亮。跟著，漢人

³⁰ 見 Antoine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I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1937), pp. 133-136; Antoine Mostaert, *Folklore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II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1947), pp. 189-195. 又見前書之日文譯本，磯野富士子，〈オルドス口碑集：モンゴルの民間伝承〉（東京：平凡社，1966），頁 32-41。

³¹ Henry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ung-lo Emperor," in John G. Hangin and U. Onon, eds., *Analecta Mongolica, Dedicated to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Bloomington: Mongol Society, 1972), pp. 19-61. 參見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刺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 3 期，頁 1-18。詳細研究，見陳學霖，〈蒙古《大明永樂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3 分（2004 年 9 月），頁 515-572。

推舉一位富有膂力和謀略、名叫朱洪武的漢子當他們的領袖，在各省招集大軍去攻打妥懽貼睦爾大汗。無論如何抵抗，他的軍隊不足禦敵，於是漢人的軍隊包圍了大同城（按：應是「大都」之誤）。³²

同一故事的口述本，根據田清波的法譯，與前文略有分歧：

在妥懽貼睦爾皇帝之時，每十家漢人裡都讓一個喇嘛住著。那十戶人家娶新媳婦時，都要把她先送到喇嘛那裡過一夜，之後才歸回自己的丈夫，就這樣的暴虐漢人。在那個時代，漢人的男嬰出生後，右手的姆指都會被剝掉。為何要這樣做呢？其實是要使他們不能挽弓作戰。在那個時代，漢人向元的汗（皇帝）奉獻大量的銀物，乞求免除孩子的指頭被剝掉之舉。結果，在那三個月間出生的嬰孩的手指都沒有被剝掉。在那三個月間出生的的嬰孩當中，誕生了朱洪武（元璋）和李文忠等大量強悍的人物。朱洪武長大後，忍受不了蒙古人的壓迫，便靜悄悄和大家商量，決定一夜裡殺盡蒙古人，在六月初六夜間大家一起造反，殺掉身邊的喇嘛。後來，到了日子沒來得及起事，便再商定在八月十五日一夜把他們殺光，用他們的頭顱和心肝出去祭月亮，然後去圍住大同城（按：應是「大都」城之誤），殺死妥懽貼睦爾皇帝。」³³

這裡描述的蒙古暴虐是否實情，姑且不論，其對漢人起義的傳說故事的形成無疑提供重要資料。不過要注意兩個版本間的幾點歧異。首先，在複述每十戶漢人都被一位蒙古喇嘛管治之後，故事講出有一條蒙古法律，規定漢人的男孩在出生後必須將右手姆指剝去，使他們不能挽弓。同時，文獻本僅說在五月五日密議起事，沒有透露原先商定的日期，後來才說改在閏八月十五日夜間採取行動。口述故事卻說議定在六月六日夜間造反，其後因準備不及，於是改在八月十五日夜間舉事。此外，還引進朱元璋作為起義的領袖，

³² Henry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ung-lo Emperor," in John G. Hangin and U. Onon, eds., *Analecta Mongolica, Dedicated to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pp. 40-41.

³³ Antoine Mostaert, *Folklore ordos*, pp. 189-190.

與文獻本說他在事後被民眾推舉為領袖有出入。綜合兩個版本，與史事記載比較，蒙古所傳故事有三點突出歷史與傳說的相互交融。第一，是說妥懽貼睦爾皇帝之時，每十家漢人裡都讓一個喇嘛住著，被其勞役，而兒童們更受到虐待。第二，是這些喇嘛不但蹂躪那些男童，而每當女孩要出嫁，便以取初夜權為藉口，先把她帶走加以侵犯。第三，是說漢人受不了殘暴虐政，暗中在妥懽貼睦爾在位的四十二年（應是三十五年）五月五日策動一起造反，殺掉身邊的喇嘛和推翻蒙古的統治，但到時（一說在六月六日夜間）仍未準備好，於是改在同年閏八月十五日（一說在八月十五日）夜間舉事。以下謹就史文略加爬梳說明。

關於第一點，說妥懽貼睦爾皇帝之時，每十家漢人裡都讓一個喇嘛住著，被其勞役，而兒童們更受到虐待，這處顯然反映漢人在蒙古統治下所受殘暴待遇的集體回憶，事實是否如此，蒙古族本身的記載未有表襮。上面曾提到《元史·陳天祥傳》報導天祥於元初知江西興國軍事時，「以十家為甲，十甲有長」，引進一套類似漢人前朝的農村里甲制度以管治郡民，疑是「十家養一韃」的史源。不過，蒙古故事所說喇嘛對轄下漢人家戶的男童及處女的欺凌蹂躪，似乎與前述元初徐大焯《燼餘錄》所反映的較為接近。蒙古故事糅雜多種反映漢人集體記憶的傳聞，這件事所受漢民族傳說的影響，不言而喻。

關於第二點，說這些喇嘛不但蹂躪漢人家庭的男童，而每當女孩要出嫁，便以獲取初夜權為藉口，先把她帶走加以侵犯。這個駭人的說法恐怕不是歷史事實，因為蒙元漢文官私載籍及明代史誌隨筆，都未有類此記載。不過，處女在出嫁前要請僧侶或法師破損處女膜，以流血象徵驅除童貞的邪惡，作為成年待婚的儀式，是中古時代中南亞地區，包括中國及南海島嶼的一些民族，在佛教及原始宗教影響下所流行對生殖器崇拜的風俗。1930年，日本學者岩井大慧發表〈元代の佛僧と成女式と〉一文，對這課題作詳細研究。³⁴記

³⁴ 岩井大慧，〈元代の佛僧と成女式と〉，收入氏著，《日支佛教史論攷》（東京：東洋文庫，1957），頁357-544。

載顯示在宋、元、明時代，由於受喇嘛教和婆羅門教僧侶的影響，西夏、西藏、古印度、真臘和暹羅諸國的一些民族，都流行這種成女儀式。例如，宋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韃事略》載：「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室女〉云：「富家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關於僧道成女式則擇夜間而行：「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身，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鄰各點於額上。」又言：「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明馬歡《瀛涯勝覽·暹羅國》記：「男女婚姻，先請僧迎男子至女家，就是僧討取童女喜紅，貼於男之面額，名曰『利市』，然後成親。」³⁵可見請僧侶討取童女喜紅，轉貼於男之面額，已演變為成親的形式，而『利市』的典故由此而起。此處言僧侶去其童身，即是以指挑損處女膜，膜損流血在宗教上有去邪的意義，故此種由僧道祭司主持的成女式極為神聖，並非指以口破瓜或甚至與女交媾之事。雖然僧道祭司藉此風俗與童女交媾並非絕無，但會被視為軌外的行為，為教規戒律所不容。這種盛行亞洲的習俗與中古歐洲的「初夜權」(ius primae noctis)觀念類似，但是歐洲的僧侶主要以交媾為成女儀式，造成不少淫慾犯姦的穢行。蒙古和元代中國（少數民族地區除外）未流行成女的風俗，但是《元史》卻有妥懽帖睦爾皇帝之時，入朝的西藏番僧取良家女供奉為樂，殃及禁中君臣的記載。〈哈麻傳〉云：「帝乃詔以……西番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於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³⁶蒙古故事說喇嘛不但蹂躪男童，而每

³⁵ 彭大雅著，徐霆注，王國維箋注，《黑韃事略箋注》（北平：文殿閣書莊，1936），頁108；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20；周達觀著，夏竦校注，《真臘風土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06-107。按：頁108註「陣毯」，謂其詞乃馬來語譯音，由梵文 *cinta* 而來，華人稱之為「利市」云。

³⁶ 宋濂等纂，《元史》，卷205，頁4583。關於西番取民女與元順帝共淫事，權衡《庚申外史》記載尤詳，參權衡著，任崇岳箋，《庚申外史箋證》，頁70-71。

當女孩要出嫁，便以獲取初夜權為名加以侵犯，顯然反映附會這些歷史上的民間風俗，醜化西藏喇嘛僧的穢迹惡行。這一件是蒙古民族故事獨有的情節，漢人所傳有關蒙古政權如何專制壓迫漢民族的傳聞都很少涉及。

至於第三點，故事說漢人在五月五日暗中策動一起造反，殺掉身邊的喇嘛和推翻蒙古的統治，但到時（一說在六月六日夜間）仍未準備好，於是改在閏八月十五日（一說在八月十五日）夜間舉事。五月五日為紀念屈原的端午節，起義者大概借此節慶之日，策動造反，密議一同採取行動殲滅蒙古甲主。傳統的說法都說在閏八月或八月十五日起義，因為故事是以在月餅餡內藏字條，約在中秋夕行動為中心，八月十五就是漢人最重視的年節。不過，如前所述，在漢人的傳統裡，是日起義反抗政權，又有其他的歷史事例。自明中葉以來，閏八月十五日被一些民間宗教信仰者認為是變天之日，明清時期這一日舉事動亂的特多。例如，清中葉八卦教首領林清，便利用本教〈天書〉內「八月中秋，中秋八月」的讖語，在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即第二個閏八月中秋日，率眾闖進北京紫禁城，企圖刺殺嘉慶皇帝，驚動朝野一時，加深民衆迷信是日都會出現變亂。清末流行的元末劉伯溫「八月十五殺韃子」故事又是另一事例。蒙古人入主中原日久，難免沾染漢人風俗，所以很可能汲取漢人在八月十五藉慶祝中秋節舉行反抗蒙古統治的傳說，與自身的傳說配合，發展出內容更充實，且蒙、漢傳統交融的傳說故事。³⁷

這個流傳於蒙古的元末漢人在中秋節殺韃子的故事大概是單獨發展。與漢人流傳的故事比較，蒙文版本的內容比較簡單，將重點放在喇嘛殘虐迫害漢人為民眾造反的源泉，並未交代領導者如何策劃在中秋夕起事，看來比較粗糙和早出，亦限於長城內外地區流通。由於故事是收入於1907年從舊本鈔錄的一份蒙文文獻，因此便成為這一類唯一有年代可考的傳說故事。漢人的版本內容有些與蒙古版本相似，但因為加插劉伯溫策劃在中秋夕舉事，預先

³⁷ 關於此事件的論著甚多，簡介見莊吉發，〈閏八月——民間秘密宗教的末劫預言〉，《歷史月刊》，期92，頁61-65；及鄭志明，〈「末劫預言」與「卯劫觀音」〉，《歷史月刊》，期92，頁65-69。

把字條藏在月餅餡內，民眾一掰開月餅見到指示，便起來殺戮身邊的蒙古人，整個故事便加重了戲劇性和神秘性。事實上，「八月十五殺韃子」這個故事，與劉伯溫本身家喻戶曉的傳說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因此要進一步了解這個元末漢人起義傳說故事的來龍去脈，要深入探索劉伯溫預言傳說的發展。

五

回顧中國古代人物，劉基（伯溫）之從明太祖的帷幄謀臣、機密軍師、開國創業建立大功的浙東名儒，在身後幾百年被逐漸神化，變為通曉天文曆算的占卜星象家，陰陽術數雜著及預言書〈燒餅歌〉的撰者，和北京「八臂哪吒城」設計師的神秘傳奇人物，是罕有的歷史文化現象。筆者曾撰專書探索劉基神化的過程，謹將幾個重要的階段摘要報導，以便解釋在民間傳說裡，劉伯溫與「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何以被拴在一起。簡言之，劉基的神化緣於江浙文人烘托誇大他的才藝謀略，始於青田同鄉黃伯生撰寫〈行狀〉，說他遊西湖見異雲起，預卜朱元璋興於金陵，仰視乾象，知天命有所攸歸，又說他其後輔助朱元璋征戰群雄，以觀察星象指授攻戰，結果大捷。其他文士接踵，編造有關劉基的各類玄怪荒誕故事，衍生不少神奇異聞，使他成為各類型傳說的箭垛。到萬曆(1573-1620)中葉，敷演開國事跡的講史《英烈傳》面世，將他塑造成小說化的傳奇人物。這裡劉基被虛構為忽必烈汗的漢人輔佐、儒釋道兼資的劉秉忠(1216-1274)的孫子，又變成《三國演義》裡的蜀漢謀臣諸葛亮(181-234)，一位能呼風喚雨的道士和神算軍師，利用法術謀略助朱元璋征戰，大勝群雄。明末編纂的《續英烈傳》再謠傳劉伯溫預知前事，說伯溫曾應太祖之請呈上〈東明曆〉，預言建文帝將罹燕王朱棣「靖難」之禍，留下一密封筐子，囑交建文到時啓視；及燕兵攻陷南京，建文打開筐子，內有剃刀一把，度牒三張，因與左右落髮出亡。

另一方面，從明中葉至清代，坊間出現不少託名劉伯溫著述的天文曆算、陰陽卜筮、星象堪輿的各類駁雜猥書，許多風行一時，到現代仍然流通，如

《清類天文分野〔直省〕之書》、《白猿經風雨占候圖》、《三命奇談滴天髓》、《奇門遁甲》等等，把劉基變得更神奇玄秘。到清中葉後，由於「反清復明」的秘密會社和革命分子的煽動宣傳，劉伯溫被進一步神化為逆知未來的大預言家，遺下〈燒餅歌〉推測天下國家的命運。在政治動亂期間，民間不時傳出託名伯溫撰作的「救劫」碑文或讖言，隱喻當前的災難及拯救辦法，據說一一應驗。最後，清末民初坊間文藝家又敷衍忽必烈的輔佐劉秉忠，據密宗那吒神的身軀形象規劃建造大都「那吒城」的傳說，虛構為劉伯溫與成祖軍師姚廣孝(1335-1418)競賽，按照哪吒三太子的模像繪圖製造北京「哪吒城」的故事，把劉伯溫的神化推至極高峰。³⁸

從這些滾雪球式的傳說來看，劉伯溫與「八月十五殺鞦韆」故事拴在一起，成為民間慶祝佳節談助的對象，與他在清中葉以後被反清復明的秘密會黨、革命分子及閭閻百姓神化為滿清敗亡的預言家，遺下讖書〈燒餅歌〉，及救劫碑文預測世運有密切的關係。據明末清初稗史，劉伯溫曾遺下碑文預言明末某地動亂，又留下圖像描繪思宗崇禎帝(1628-1644 在位)於流寇攻陷北京宮城後自縊的情狀。清嘉慶十八至二十年間(1813-1815)軍機處的檔案卷牘，又報導地方流出碑記，盜賊鈔傳讖書倡亂，其中有〈東明律〉及〈咬餅歌〉，疑即是〈東明曆〉及〈燒餅歌〉，假託劉伯溫撰述預言書。³⁹劉伯溫又被「反清復明」的秘密會社，如天地會的黨徒利用作為宣傳工具。天地會於康熙初在福建崛起，隨後蔓延到兩廣、江西、湖南、貴州各省，成為民國革

³⁸ 按：元朝人稱「那吒」，明以後稱「哪吒」。關於劉基的神化過程及其傳說的發展，詳見陳學霖，《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及陳學霖，〈關於劉伯溫傳說的研究〉，收入氏著，《史林漫識》（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01），頁 276-285。又見 Hok-lam Chan, *China and the Mongols: History and Legend under the Yuan and Ming*, Part VII, VIII. 其他有關論著，見蔣星煜，〈朱明王朝神化劉伯溫的歷史過程〉，《杭州大學學報》，卷 14 期 1（1984 年 3 月），頁 98-104、109；周群，〈劉基——從歷史到神化的嬗變〉，《大陸雜誌》，卷 96 期 3-4（1998 年 3-4 月）頁 16-19、46-48。又見王見川，〈劉伯溫傳說與《燒餅歌》：兼論「鐵冠圖讖」的形成〉，《臺灣研究通訊》，期 4（2002 年 10 月），頁 161-194；及楊訥，《劉基事跡考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³⁹ 有關資料繁多，已見王見川，〈劉伯溫傳說與《燒餅歌》〉，頁 173-177 徵引，為節省篇幅，在此不贅。

命的一股主要力量。⁴⁰從咸豐(1851-1861)、同治(1862-1874)間傳鈔的會黨文獻所見，在天地會的神壇「木楊城」，劉伯溫與諸葛亮分別被奉祀為神算軍師，祭壇上設有寶塔神位，擬作的詩篇崇祀他為反清復明的英雄，說他遺下讖語預卜滿清的覆亡。例如〈伯溫塔詩〉說：「大明始創劉軍師，辭官不做效先儒。寶塔流傳山上去，錦囊批落把汨(清)除。」〈劉伯溫錦囊詩〉又說：「伯溫遺下一首詩，賢人聞者要知機。二九山河歸我主，一統乾坤為洪兒。」現見會黨文獻收錄託名劉伯溫的反清碑記預言尚有三數，顯示他在政治宣傳上的魅力。⁴¹這一來，劉伯溫便躍升為先知先覺，預言推翻滿清的神秘民族革命英雄，讖書〈燒餅歌〉假託他為原撰者便是一個自然的發展。

〈燒餅歌〉是近代中國一部流傳最廣、影響至鉅、家傳戶誦的預言書，據說劉基伯溫以讖語寓意，推測未來天下國家的命運，自明初至民國這幾百年發生的許多重要大事，都一一明驗。此書開卷說明太祖朱元璋驚於劉基術數神奇，問以天下後事，太祖問一事，伯溫隨即答之。據說所預言明代事，如燕王「靖難」之變，英宗(1436-1449；1457-1464 在位)北狩復辟，閹宦魏忠賢(?-1627)亂政，及崇禎亡國於流寇，都應驗不爽。這些預言，皆以「拆字」方式綴成詩句表達，每詩談一事，下有小注說明應驗。例如記崇禎年號：「祖宗山上貝衣行」(注：崇禎)，便是拆「崇禎」二字。又如述李自成(?-1645)亂事：「卦曰：『木下一了頭，目上一刀一戊丁』」(注：李自成亂)，便

⁴⁰ 近人對天地會的研究甚多，主要為施列格(Gustaaf Schlegel)著，薛澄清譯，《天地會研究》(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秦寶琦，《清前期天地會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及赫治清，《天地會起源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等書。英文近著見Dian Murray / Qin Baoqi, *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及Barend J. Ter Haar,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Leiden: E. J. Brill, 1998). 後書 pp. 314-315, 332-333 提及劉伯溫的預言碑記。

⁴¹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5)，卷4，頁11下；卷5，頁3下。其他有關詩句，見卷5，頁4上、9上；卷6，頁16下。又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室等編，《天地會》(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頁7；庾裕良、陳仁華等編，《廣西會黨資料匯編》(柳州：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516；及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1016等徵引。

是拆「李自成」三字。〈燒餅歌〉預言明代事比較翔實，因為大多綴拾明清稗史所傳異聞；預言清代事就隱晦恍惚，除卻各朝的遞嬗外，所言故事遠不及前代事的瞻詳。就內容而論，〈燒餅歌〉充滿濃厚的民族思想和反建制意識，內文屢屢出現「胡人」或「胡」字。預言明代事時，「胡人」無疑指元亡後頻頻擾邊的蒙古餘孽，後此的「胡人」當指滿清，隱喻滿清的興起和覆亡。〈燒餅歌〉有多處言胡人敗亡，如「帝曰：『胡人到此敗亡否。』」基曰：『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休。』」又「帝曰：『胡人此時尚在否？』」基曰：『胡人至此，亡之久矣。』」據此推斷，〈燒餅歌〉顯然是反清分子託名劉基撰作，藉此掩飾反抗情緒，並藉其號召以廣宣傳。〈燒餅歌〉的夾注對預言的傳播極為重要，因為若無注釋，讀者便無從明白所指。這些夾注很可能與原文同時出現。其預言明代事，因為本諸稗史，所以易於詮釋；至於言清代事的小注，則顯然與「拆字」的原文直接有關。這些夾注止於「光緒」，顯示注清代事的是光緒中人，提供了其書編寫時間的上下限。⁴²

筆者曾見〈燒餅歌〉二十多本，最早的是光緒年間刊行，與近現代通行本的行款接近。年代最早的是臺灣學者王見川所藏，標題「丁酉年新鐫」〈劉先生《金柜錦囊》〉所收本，由上海石印局發售。丁酉為光緒二十三年(1897)，此本言「新鐫」，似從更早的「祖本」複印。後出的有單行本數種，有在東京出版的別題〈帝師問答歌〉，疑是旅日革命黨人印行，作為宣傳刊物。近現代流通的多是收入《中國二千年之預言》（一稱《中國預言七種》，內有託名唐李淳風[602-670]的《推背圖》）的排印本。⁴³〈燒餅歌〉的源流文本並無說明，唯一線索是《中國預言七種》的序跋，包括英人曼根氏(Macon)的原序並釋文，及署名苕溪李中和清溪散人的識語，三人事蹟皆無考。根據所說，〈燒餅歌〉及其他六種預言書，係於 1859 年英法聯軍火劫圓明園時自大內藏

⁴² 關於劉伯溫〈燒餅歌〉的詳細研究，見陳學霖，〈劉伯溫《燒餅歌》初考〉、〈劉伯溫《燒餅歌》續考〉，及〈東瀛刊行之中國預言書述評〉，以上三文皆收入氏著，《史林漫識》，頁 286-333、334-365、366-393。又見王見川，〈劉伯溫傳說與《燒餅歌》〉，頁 161-194。

⁴³ 參王見川，〈劉伯溫傳說與《燒餅歌》〉，頁 181-183。

庫流出，為某軍人拾得，後流入曼氏之手，繼經他手傳諸李中。李氏言曾持此書籍以質張之洞(1837-1909)，說是金聖歎（金人瑞，1833-1909）手批本，及金氏籍沒，此書輾轉為他人收藏，至乾隆(1736-1795)時徵書，遂獻上入大內，至圓明園火劫始再流出。序跋真偽莫名，〈燒餅歌〉的流傳是否如此，文獻無徵，需從可靠資料探索。⁴⁴

事實上，〈燒餅歌〉有更早的歷史。光緒年間，王柳門《劍青室隨筆》⁴⁵載：「今所傳〈燒餅歌〉，為明鐵冠道人張中撰。太祖遊雞鳴寺，見刹宇高敞，欲更置大內宮殿，道人命僧眾迎叩，上問何以知之，告有鐵冠子預言。一日，上方食餅，即以餅賜道人，就問休咎，於是未來事一一寓意言之。或又謂之〈蒸餅歌〉，或謂是劉誠意作，未知孰是。今之傳本，皆紊亂不可究竟，且鈔字譌誤不一，又非真本矣。」這則資料極為珍貴，因為它透露〈燒餅歌〉又傳為明鐵冠道人張中所作，別稱〈蒸餅歌〉。王柳門生於咸、同年間，疑卒於民國初年，可見在較早時期〈燒餅歌〉有兩種不同作者的鈔本，一傳張中，一傳劉基，至光緒年間始單傳劉基之名。不過這時期的〈燒餅歌〉內容為何，是否與坊間流傳者相同，亦一大難題，只能從張中的傳記資料推敲。

張中，字景華（一字景和），號鐵冠子，江西臨川人，是明初傳說最豐富的道士之一。《明史·方技傳》有傳，源出宋濂(1310-1381)應明太祖邀請撰的〈張中傳〉。道人幼得異人傳授，深通陰陽術數、堪輿占星之學，後來朱元璋徵入帷中，據說屢從征伐，望氣決休咎，言出必驗。如鄱陽湖一役，曾觀雲氣，預卜陳友諒陣亡。及朱元璋定鼎金陵，凡諸營建，必著他卜宅相地，大見信用。明人記載張中的傳說甚夥，神奇處亦不下於劉基，而且二者

⁴⁴ 見佚名編，《中國二千年之預言》（上海：華夏哲學理闡微社出版，1937），卷首所刊序跋。有關〈燒餅歌〉的版本，詳見註 42 引論著。

⁴⁵ 此書收入《南京文獻》，第 2 輯，引文見頁 14。《南京文獻》由南京市文獻委員會、南京市通志館編（南京：南京市通志館，1947），有民國 13 年甲子(1924)金嗣芬序。

互相交插附會。⁴⁶楊溥(1372-1446)《禪玄顯教編》最先說他留下預言：「上即位，召至，問以國祚事，但云『過唐不及漢』，復大書一『附』字授帝，後辭入山，不知所在，今傳〈鐵冠道人歌〉一篇。」⁴⁷嘉靖鄭曉(1499-1566)《今言》對張中的預言有較詳細的描述。記云：「孝陵（太祖）嘗微行至一寺中，群僧伏門道傍迎。上曰：『何以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道人至。手上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願直述，無我諱。道人訊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裡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敢傳。」⁴⁸此處所言「戊寅」為洪武三十一年(1398)，指太祖駕崩；「壬午」為建文四年(1402)，喻燕王篡奪。〈燒餅歌〉的預言，大抵濫觴於此。萬曆顧起元(1565-1628)《客座贅語》綜合前說，又有張中撰〈蒸餅歌〉的異聞：「紀聞言太祖嘗遊雞鳴寺，見刹宇高敞大內，欲毀而更置之。鐵冠道人令眾僧迎訴，上問何以知之。曰：『鐵冠道人語。』上異之，遂止。因召道人問曰：『今日我有何事。』對曰：『太子某時進餅。』時中秋日也。上命鎖於房以驗。及時，太子果進餅。上方食，思道人，遂以口所食餅賜之。比啓鑊，道人已失所在矣。留〈蒸餅歌〉於案以獻，歌辭於靖難、土木之事，一一明驗。」⁴⁹這裡所說的〈蒸餅歌〉雖然只透露少許內容，但明顯是〈燒餅歌〉命名的來源，至於文本有無剽竊〈蒸餅歌〉，由於前者原文今日無傳，難以稽考。但是清初查繼佐(1601-1676)《罪惟錄》的〈張中

⁴⁶ 宋濂，〈張中傳〉，收入氏著，《宋學士文集》（《四部叢刊》本），卷9，頁3上-4下，自稱此傳係據朱元璋筆授資料纂成，其中神奇成分，疑係明太祖自造。後此官私撰傳，如《明史》，卷299，頁2640，大抵據此。明代稗乘傳張中異聞頗眾，資料詳見 Hok-lam Chan, "The Prophecy of Chang Chu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egend of an Early Ming Taoist," *Oriens Extremus* 20:1 (June 1973), pp. 65-102; 又見 Hok-lam Chan, *China and the Mongols: History and Legend under the Yuan and Ming*, Part IX. 有關張中預言故事見註47、48、49、50。

⁴⁷ 楊溥，《禪玄顯教編》，《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21。此《鐵冠道人歌》疑是附會建文末年流傳燕王起兵「靖難」之謠言而成。

⁴⁸ 鄭曉撰，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4，頁179-180。所傳故事後來抄入傅維麟，《明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160，〈張中傳〉，頁3160-3162，成為清人傳佈張中預言故事的主要資料。

⁴⁹ 顧起元撰，譚棟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2，頁38。

傳），說他遺下〈缺餅歌〉，似是另一異名，可見這本預言書在明亡後繼續流傳。⁵⁰

雖然反清會黨都利用劉伯溫，然則〈燒餅歌〉的原作者，是否為天地會或是其他秘密會黨人士，由於資料缺乏，難以說明。最近王見川博士撰文，引述刊於日治臺灣出版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明治三十一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二十日，標題〈古今參考〉，及同年十二月三日號，標題〈讖言辯誣〉兩篇短論，對〈燒餅歌〉的源流有新啓示。前篇摘引〈燒餅歌〉一則並按語云：「試觀中國前賢劉伯溫讖緯清國隱語，近今氣運是值『二四一旗難蔽日，思念遼陽舊家鄉。東拜斗，西拜旗，南逐鹿，北逐獅，分南分北分東西。』此天數註定，……可不慎歟。……」後篇疑此讖言（書作〈吃餅歌〉）係太平天國的軍師編造，假託劉伯溫作為宣傳。其言說：「夫〈吃餅歌〉全文，蓋當長髮匪徒，擾亂清國之時，其偽軍師方始假託、謬造，以其蠱惑乎眾心也。何以見之？清國老學究常言：此偽讖文，同治以前，雖極博者，未嘗得一見之，迨同治初年盛行於世。……」⁵¹此偽作的長髮軍師未悉何人，與會黨有無關係，但是今傳的〈燒餅歌〉讖言有濃厚的反外族統治氣味，並屢屢為後來以會黨為首的偏激革命分子利用，作為反清行動的宣傳則是事實。例如，鄒容(1885-1905)撰作《革命軍》，在原刊本的結論末頁留下口號：「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跟著鈔錄劉基的預言為見證：「劉伯溫〈燒餅歌〉曰：『手執大刀九十九，殺盡韃子方罷手。』」《革命軍》脫稿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有章炳麟(1869-1836)是年五月撰序；作者將今本〈燒餅歌〉內文的「胡人」書作「韃子」，「韃子」蔑指滿洲人，是當時革命黨打倒消滅的對象。⁵²此外，

⁵⁰ 見查繼佐，《罪惟錄》（《四部叢刊三編》），〈列傳〉，卷 26，〈方技·張中〉，頁 22 下。原文云：「按，〈缺餅歌〉中有『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裡逃。』」似曾親見其書。

⁵¹ 《臺灣日日新報》，號 166，明治三十一年(1898)11 月 20 日、12 月 3 日，〈漢文報〉；參王見川，〈劉伯溫傳說與《燒餅歌》〉，頁 178-180。

⁵² 此見鄒容，《革命軍》原刊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頁 46。章炳麟序，又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冊上，頁 163-165。《革命軍》有 John Lust 英

現存三數在日本東京發行，題名〈帝師問答歌〉的〈燒餅歌〉刊本，其一刊於宣統三年[1911]的題為開國紀元 4603 年，採用革命黨人提倡的黃帝紀元，表示與滿清國統斷絕。這就說明他們印行〈燒餅歌〉是用以宣傳民族革命。⁵³

《革命軍》引用劉伯溫〈燒餅歌〉「殺韃子」的預言，突出清末革命的目標和手段。「殺韃子」是一個很鮮明和感性的口號，不但掀起漢民族對滿清統治的仇恨，煽動民眾以熱血推翻異族暴政，對於共和國新政權建立後，漢民族情緒的高昂，和大漢主義意理的產生有很大的影響。按：「韃子」或「達子」一詞源出韃靼，宋元泛稱蒙古各部為韃靼，明人亦然。清官修《明史·韃靼傳》列入〈外國傳〉，卷首云：「韃靼，即蒙古，故元後也。」⁵⁴但到清代漢人反抗滿族統治，「韃子」成為專指清朝統治者的蔑稱。例如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的領導楊秀清(?-1856)和蕭朝貴(?-1852)，在其〈奉天討胡檄布四方〉便有「康熙偽妖暗使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神，遂產妖人。」這裡將漢人相傳的蒙古虐政，轉移用於蔑指滿族管治，可見反清分子之附會歷史記憶作政治宣傳，間接為此故事的反覆利用提供一個重要見證。1853 年（咸豐三年），上海小刀會的〈大明國統理政教天下招討大元帥〉劉麗川的起義指示，亦有「韃夷當滅，明復當興」之句。⁵⁵從清末興中會成立到辛亥革命時期，許多反清的文告都用「韃虜」指滿清。1894 年（光緒二十年）底，

譯，題名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30* (Paris: Monton & Co., 1968)。〈燒餅歌〉引文翻譯見 p. 127。按：一般〈燒餅歌〉原文為「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休。」後出重印的《革命軍》，則將「韃子」改回〈燒餅歌〉原文作「胡人」。

⁵³ 黃帝紀元首次出現於 1905 年 6 月，由宋教仁主編，在東京出版之《二十世紀之支那》創刊號。按：前此一年冬季，宋教仁在籌辦此雜誌時，讀到陳天華撰寫的《驚世鐘》，見扉頁上有一張軒轅黃帝的肖像，大受感動，認為凡炎黃子孫，應一律採用黃帝紀元。因此，他便在該創刊號所寫的〈中國新紀年〉一文，提出將當時光緒三十一年(1911)改為開國紀元 4603 年，（傳說中黃帝開國即位之年為公元前 2038 年），表示與滿清國統決絕。參考唐凌編著，《歷史紀年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頁 137-140。

⁵⁴ 見張廷玉等，《明史》，卷 327，〈外國八·韃靼傳〉，頁 8463。

⁵⁵ 引文見羅爾綱編，《太平天國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頁 73；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所籌備委員會編，《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頁 4。

孫中山(1866-1925)在檀香山(Honolulu)創立興中會，翌年正月在香港設立總機關，誓辭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而在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8月在東京成立的同盟會，其十六字會綱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由此可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便是漢民族革命的鮮明旗幟。⁵⁶這裡尤需注意，排滿運動一開始便以「反清復明」為口號，而明朝係由漢人推翻蒙元政權而建立，恢復中華正統，因此，革命志士及漢人學者極端尊崇明朝。從清末起直至民國國民黨統治時代，在漢民族中心及儒家道統的意理指導下，明太祖及其輔佐，如劉基等謀臣，就以對革命的貢獻及恢復中華正統獲得官方的供奉為神壇人物，處於超然的歷史地位。⁵⁷這個發展無疑強化民間對劉伯溫預言「殺韃子」的認知與感受。

這一來，在清末排滿澎湃的宣傳影響下，就不難了解為何民間將神化為大預言家的明太祖輔佐劉伯溫，附會為策劃「八月十五殺韃子」計謀，推翻蒙古元朝統治的大功臣。在一方面，劉伯溫是秘密會社和革命分子崇祀為預卜滿清覆亡的明朝開國神機軍師，民間崇敬為排滿驅虜的漢民族英雄，而明朝是漢人起義推翻外族政權所建立，因此雖然史誌並無記載劉伯溫參與推翻

⁵⁶ 引文見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出版，1969），頁51、56；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第二版），頁36。參考朱宏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2章。

⁵⁷ 劉基獲得甚多清末民初革命志士及國民黨軍政教界的敬仰推崇。例如，著名革命家、國學大師章炳麟(1868-1936)，素仰慕劉伯溫事業志行、道德文章，願死後與劉公塚墓相連。民國4年(1915)章氏遭袁世凱總統(1859-1916)禁錮，十月撰〈終制〉篇，聲稱古今人「功狀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劉文成公」，又言葬地未定，「其為文成舊塋畹地，足以容一棺者，託焉安處！」十一月作〈《誠意伯集·序》〉，又再言「咨於公之裔孫（劉崧申），而先為壙，密邇於公，以申生死慕義之志。」見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冊4，《太炎文錄初編·文錄補編》，頁498-501；參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冊上，頁503-505。民國以來，為位於浙江文成縣南田鎮的「誠意伯廟」撰寫楹聯的名流甚眾，包括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國民黨元老居正(1876-1951)，及軍界要人方覺慧(1885-?)等。林森一聯云：「出處進退與任聖冥符，運啓風雲成，曠代勳華民族史；事業文章有姚江繼武，桑梓崇俎豆，千秋祠宇括蒼山。」參郝兆矩、劉文峰，《劉伯溫全傳》，頁432-440。後來方覺慧編纂《明太祖革命武功記》，蔣中正總統(1887-1975)賜序，民國29年(1940)在南京出版（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影印），又強調劉基對明朝開國的貢獻，代表國民黨官方對明朝革命志業的高度評價。

元朝，坊間認為劉伯溫在這個運動中佔著決定性的作用，從事各種影射附麗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民間流傳的劉伯溫讖書與「餅」有密切的關係。此書題名〈燒餅歌〉，是因為開卷說明太祖在內殿食餅，方啖一口，聞劉伯溫入見，以碗覆之，問碗中為何物，答稱是食物，太祖大為驚異，於是問以天下後事，伯溫一一作答如儀。這書的命名，據前所述，是套取明初鐵冠道人張中的預言書〈蒸餅歌〉，〈蒸餅歌〉在明清間又稱〈缺餅歌〉，而劉伯溫〈燒餅歌〉較早又有〈吃餅歌〉及〈咬餅歌〉之名，都與「餅」分不開。因此，民眾在「中秋夕殺韃子」的傳說，加插劉伯溫在月餅餡內藏字條傳訊來烘托附麗，是順理成章的發展。再者，前面曾指出，〈燒餅歌〉裡的預言屢說「胡人」的敗亡；「胡人」在明朝指蒙古餘孽，在清朝則影射滿洲人，都是指異族統治者。鄒容《革命軍》所引的〈燒餅歌〉讖語揚言「殺盡韃子方罷手」，若果這不是鄒容私下改動以脗合當時的排滿宣傳，〈燒餅歌〉早就用「韃子」之名鄙貶清朝的統治者。這一來，故事加插作為漢民族英雄的劉伯溫，主導「八月十五殺韃子」計謀召集各地民眾同時起義，就不單指殺害蒙古人，亦影射清末革命消滅滿洲人，回復漢族統治中國，其時代政治意義就不同凡響。因此，編造宣揚這個傳說故事的，若不是革命會黨中人，就是受了他們宣傳的影響，其始作俑者可能在清末，到民國以後，故事就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傳播越遠，變化也就越來越廣。

六

總括所述，這些膾炙人口的元朝末年漢人八月十五中秋夕起義，推翻蒙古政權的傳說故事是錯綜複雜的，不但保存一些歷代流傳對蒙古統治者壓迫漢民族的集體記憶，慶祝佳節吃月餅的風俗，而且反映一些近世紀反滿清政權的會黨革命志士或他們的同情者，利用這個歷史上漢人成功推翻外族統治的事例，套用明末清初已逐漸神化的劉伯溫的預言故事，發展成為全國性主流的漢人中秋節夕起義，反抗蒙古政權的傳說故事。與此同時，民間還流傳

一些與此相關的地方性傳說，例如以張士誠為主謀的中秋夕起事抗暴，以及內地蒙古人流傳關於漢人在中秋夕起來殺害他們祖先的故事。以下綜述幾個重要的發展過程和特色。

首先，這些傳說故事的雛形，最早見於徐大焯《燼餘錄》記述蘇州吳縣在蒙古統治下受到的殘虐待遇。徐氏雖是元初遺民，其書秘藏到光緒始刊印流通，所述是否真確難作判斷，或者只是追記地方傳聞，但顯然反映一些蒙元暴政的事實，與漢人採取反抗行動的集體記憶。民間對蒙古統治者壓迫的其他指控：「十家養一韃」和「十家合用一把刀」，亦反映一些歷史事實，說書者將之形式化及小說化，與前者的情節糅合起來成為故事的骨幹。其後，大概由於清中葉以後，民間迷信八月十五中秋為三元劫運變天之日的影響，編故事的套入傳統慶祝佳節吃月餅的風俗，把一些史實時序倒置和神秘化，發展成這些漢人在餅餡內藏字條，傳訊在中秋夕起義殺害蒙古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大概是在清末從江南地區傳出，原本未悉有無道出主謀名字，後來一說是張士誠，現在流傳的大多歸功於劉伯溫，看來是後起之說。此外，亦有清末的蒙文本子在內蒙地區傳出，說在元順帝統治時期，每十個漢人的家都安插一位喇嘛，把他們當奴隸般統治，這些喇嘛不但蹂躪男童，每當女孩出嫁，先把她侵犯，取走初夜權，因此引起漢人憤怒，在八月十五中秋夕一同起來殺害蒙古人。這個蒙古版本雖然採用一些漢人所傳資料，但故事比較單純，將重點放在喇嘛殘虐迫害漢人為造反的源泉，同樣反映一些相傳在蒙古統治中原時的胡作妄為，不過並無報導領導是誰，又如何策劃在中秋夕起事殺韃子，看來比較粗糙和早出，流通亦有限。漢人的故事沒有刻劃喇嘛蹂躪男童及出嫁處女，但因為一些加插劉伯溫策劃在月餅餡內藏字條，傳訊在中秋夕舉事殺戮蒙古人，推翻元朝政府，這些便加重了戲劇性和神秘性。

這些漢人抗蒙民謠之所以能大張旗鼓，主要是反清會黨及革命志士借來作政治宣傳，特別是套用神化的劉伯溫預言傳聞感召，發展為家傳戶誦、影響邇遐的傳說故事。最早見諸文字的元末漢人起義抗蒙故事，都很鮮明地反

映排外主義和反異族統治的鬥爭。「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謠的對象表面上是蒙古韃靼，實際上亦是影射滿清，不無指桑罵槐之嫌。因此故事的主要內涵，如「十家養一韃」、「十家合用一把刀」和「二十戶漢人編成一間，派蒙古人當閻長」等等，雖然是指蒙古苛政，但亦凸顯很濃厚的時代政治意識。不過，需要注意，雖然在民國早期出現的記載的確反映民族革命的涵意，亦刻意迎合當前的政治文化趨向，但到後期則不然。這時候早年的排外政治文化逐漸淡化，民族革命熱潮衰退，坊間所出的同類民謠很大程度上是文藝出版界的鈔襲，重複前人所說，為中秋佳節點綴，並無任何特殊用意。從這時期流出到臺灣和海外的元末漢人起義抗蒙故事，或是根據這些版本複製的同類故事，便不知不覺地延續清末民初的排外主義和民族革命的思潮，留下一個時代重疊複雜的歷史痕跡。⁵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神州帶來亙古未有的政治意理、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種種巨變。在新時代的文藝和社會政策的影響下，這些元末漢人起義推翻蒙古統治故事的表述有明顯變化。由於政府積極推行民族平等政策，舊社會漢族中心主義的觀念和詞彙都被摒棄，此時重新出現的故事，除卻一二偏例，不再使用「殺韃子」這個被視為傷害少數民族感情的詞彙，亦再見不到起義革命、恢復大漢江山一類不合時宜的豪語。代之而起的是反映民族平等、農民起義、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理念和詞彙。因此故事主題不是漢人反對蒙古異族殘暴統治的起義，而是民眾反抗元朝蒙古奴隸主壓迫的鬥爭，劉伯溫不再是倡導漢民族革命的英雄，有些故事雖然提到民眾利用月餅傳訊一同在八月十五中秋夕起事，但沒有突出劉伯溫為主謀，就算提到，劉伯溫也不過是明朝開創者朱元璋的機密軍師，而非大漢民族英雄。⁵⁹到了1990年代，革命鬥爭的熱情被開放改革的浪潮沖淡，文藝創作接上新時代，摒棄階級鬥爭的政治意理，在這時期出版的書刊，報導元末漢人起義故事時，

⁵⁸ 參前註 11、12、13、15 所揭資料。

⁵⁹ 參前註 16、17、18、19 所揭資料。

就以平淡的筆調處理漢蒙民族間的鬥爭。例如，1992年出版的《中華民俗源流集成·節日歲時卷》便有以下的描述：「中秋節傳到元朝末年。元朝統治者，對老百姓實行殘暴統治，那時，每十家人只能共用一把菜刀，還派一個蒙古族人監視，以防人們起來造反。眾百姓切齒痛恨極了，就利用過中秋節的機會，將造反時間、暗號寫成字條，夾在月餅裡，饋贈傳遞。大家知道了這回事，到八月十五晚上，爆竹一響，家家一齊動手，將那些元朝統治者殺了。不久，元朝被朱元璋率領明朝軍隊打敗了，元朝也就垮台了。」⁶⁰這一來，經過逐步意理及書面語的洗滌淨化，讀者也許忽視劉伯溫，領悟不到這個向來是膾炙人口、家傳戶誦的漢民族故事的歷史意義。

總之，作為近代中國傳統中秋節的主流民間故事，這個以劉伯溫為中心的元朝末年漢人利用月餅傳訊，在佳節夕起義推翻蒙古統治的轟轟烈烈事跡，相信會繼續流傳下去，內容諒不會超出前面所提供的幾個類型。不過不同時代或不同地域的中國人，或海外華裔對這個傳說故事的認知和感受，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所閱讀的不同時代編寫的刊物，對這個故事的不同鈔襲或描述所影響。至於這些不同的版本，何者是真是偽，並沒有爭論的價值，只有考察這些故事的歷史發展，窺探各個時代所表現不同的內容去找出損益因革的原委，才能對整個問題有一個全面性的了解。

⁶⁰ 雪犁主編，《中華民俗源流集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節日歲時卷，頁150。又見秦安祿、馮光榮，《中國節日及傳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頁80。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室等編，《天地會》（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
- 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所籌備委員會編，《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 不著撰者，《元典章》。北京：中國書店，1990。
-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 宋濂等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宋濂，《宋學士文集》。《四部叢刊》本。
- 吳自牧，《夢梁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 沈榜，《宛署雜記》。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
- 周密，《武林舊事》，收入丁丙輯，《武林掌故叢書》，光緒九年(1883)刊本。
- 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
- 查繼佐，《罪惟錄》。《四部叢刊三編》本。
- 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徐大焯，《燼餘錄》乙編，收入李模編，《望炊樓叢書》，蘇州文學山房據光緒中原刊本彙印，1924。
- 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北京：中華書局，1955。

- 庾裕良、陳仁華等編，《廣西會黨資料匯編》。柳州：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6。
- 張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梁章鉅撰，陳鐵民點校，《浪跡叢談·續談·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
- 陳高華等編輯，《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陳夢雷等編纂，《曆象彙編·歲功典》，卷 71、卷 72、卷 73，收入《古今圖書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34 年據雍正原刻影印本。
- 陶宗儀，《輟耕錄》。臺北：世界書局，1963。
- 陶宗儀，《元氏掖庭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黃時鑑點校，《通制條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傅維麟，《明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 彭大雅著，徐霆注，王國維箋注，《黑韃事略箋注》。北平：文殿閣書莊，1936。
- 楊溥，《禪玄顯教編》，《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
-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 鄒容，《革命軍》，光緒二十九年(1903)刊本。
- 雷銑、王棻修纂，光緒《青田縣志》，光緒二年(1876)序刊。
- 鄭曉撰，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
- 薩囊徹辰著，道潤梯步譯校，《〔新譯校注〕蒙古源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 羅布桑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著，《蒙古黃金史譯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 羅桑丹津著，色道爾吉譯，《蒙古黃金史》。呼和浩特：蒙古學出版社，1993。
- 蘇軾著，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顧起元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

權衡著，任崇岳箋，《庚申外史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二、專書

王世禎，《中國節令習俗》。臺北：星光出版社，1981。

王景琳、徐甸等編，《中國民間信仰風俗辭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

王馨一，《劉伯溫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田哲益，《細說中秋》。臺北：百觀出版社，1994。

朱淞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吳孟前、楊秉正選編，《劉伯溫的傳說》。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

尙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施列格(Gustaaf Schlegel)著，薛澄清譯，《天地會研究》。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

唐凌編著，《歷史紀年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秦安祿、馮光榮，《中國節日及傳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秦寶琦，《清前期天地會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郝兆矩，《增訂劉伯溫年譜》。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郝兆矩、劉文峰，《劉伯溫全傳》。大連：大連出版社，1994。

馬西沙，《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馬宏智，《年節趣話》。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

婁子匡，《歲時漫談》。臺北：文星書店，1967。

張紫晨，《中國古代傳說》。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

陳學霖，《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 陳學霖，《史林漫識》。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01。
- 陸家驥，《中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 雪梨主編，《中華民俗源流集成》，節日歲時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 章炳麟，《章太炎全集》，冊 4，《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喻松青，《明清白蓮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 黃泊滄，《節日的傳說》。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 楊 琳，《中國傳統節日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 楊 訥，《劉基事跡考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 葉大兵、王文寶等編，《中國風俗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
- 鄒 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第二版。
-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8。
- 赫治清，《天地會起源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 劉德隅，《明劉伯溫公生平事蹟拾遺》。臺北：自印本，1976。
- 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
- 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5。
- 韓廣澤、李岩齡，《中國古代詩歌與節日習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 韓養民、郭興文，《中國古代節日風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出版，1969。
- 羅啓榮、歐仁煊，《中國年節》。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3。
- 羅爾綱編，《太平天國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 磯野富士子，《オールドス口碑集：モンゴルの民間伝承》。東京：平凡社，1966。

- Chan, Hok-lam. *China and the Mongols: History and Legend under the Yuan and Ming*.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Co., 1999.
- Goodrich, L. Carrington, and Chaoyang Fan,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Haar, Barend J. Ter.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Leiden: E. J. Brill, 1998.
- Lust, John.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30*. Paris: Monton & Co., 1968.
- Mostaert, Antoine. *Textes oraux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I.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1937.
- Mostaert, Antoine. *Folklore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II.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1947.
- Murray, Dian / Qin Baoqi. *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三、論文

- 王見川，〈劉伯溫傳說與《燒餅歌》：兼論「鐵冠圖讖」的形成〉，《臺灣研究通訊》，期4，2002年10月，頁161-194。
- 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記疑辯〉，《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卷2期1，1933，頁1-13。
- 朱希祖，〈再駁明成祖生母爲碩妃說〉，《東方雜誌》，卷33期12，1936，頁5-19。
- 吳 晗，〈明成祖生母考〉，《清華學報》，卷10期3，1935年7月，頁631-646。
- 李晉華，〈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1分，1936年3月，頁55-57。
- 李晉華，〈明懿文太子生母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 6本第1分，1936年3月，頁45-53。
- 周群，〈劉基——從歷史到神化的嬗變〉，《大陸雜誌》，卷96期3-4，1998年3-4月，頁16-19、46-48。
- 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刺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頁1-18。
- 莊吉發，〈閏八月——民間秘密宗教的末劫預言〉，《歷史月刊》，期92，1995年9月，頁61-65。
- 陳學霖，〈蒙古《大明永樂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2004年9月，頁515-572。
- 章采烈，〈談《玄宮之碑》的史料價值〉，《江漢論壇》，1986年第4期，頁67-70。
- 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記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4分，1932，頁406-414。
- 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並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1分，1936年3月，頁79-86。
- 楊訥，〈元代農村社制研究〉，《歷史研究》，1965年第4期，頁226-254。
- 劉基（伯溫），〈燒餅歌〉，收入佚名編，《中國二千年之預言》。上海：華夏哲學理闡微社出版，1937。
- 劉孔伏、薛新力，〈談元末徐壽輝農民政權的年號及國號〉——附錄〈玄宮之碑〉碑文，1984年第5期，頁47-50。
- 蔣星煜，〈朱明王朝神化劉伯溫的歷史過程〉，《杭州大學學報》，卷14期1，1984年3月，頁98-104, 119。
- 鄭志明，〈「末劫預言」與「卯劫觀音」〉，《歷史月刊》，期92，1995年9月，頁65-69。
- 盧心銘，〈元代人民起義與民間歌謠〉，《元史論叢》，第5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蕭啓慶，〈蒙元興亡識緯〉，《歷史月刊》，期 92，1995 年 9 月，頁 54-60。
《臺灣日日新報》，號 166，明治三十一年(1898)11 月 20 日、12 月 3 日，〈漢文報〉。

岩井大慧，〈元代の佛僧と成女式と〉，收入氏著，《日支佛教史論攷》。
東京：東洋文庫，1957。

Chan, Hok-lam. "The Prophecy of Chang Chu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egend of an Early Ming Taoist," *Oriens Extremus* 20:1, June 1973, pp. 65-102.

Serruys, Henry.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ung-lo Emperor," in John G. Hangin and U. Onon, eds., *Analecta Mongolica, Dedicated to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Bloomington, Indiana: Mongol Society, 1972.

Shaw, J. S. (邵循正)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ious Theory of the Mongol Blood in the Ve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20:4, 1937, pp. 492-498.

Liu Bowen and the Folk Stories “Killing the Tartars on Mid-Autumn Day”

Hok-lam Ch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igin and sources of a series of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olk stori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Killing the Tartars on Mid-Autumn Day,” and assesses its affinity with political and folkloric development. These stories reflec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misery of the Chinese peasants in the Huai and Yangzi River region under the repressive Mongol rule. They describe how the peasants, tipped off by a message found hidden in the stuffing of a moon cake on the night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rose up in rebellion, slaughtered the Mongols and toppled the Yuan dynasty. “Tartars” was a derogatory ethnic appellation for the Mongols. Later versions of these stories attributed the ingenious moon cake plot to Liu Bowen, the great minister of the Ming dynasty founder who was later mythologized as a sagacious strategist and clairvoyant prognosticator, author of the renowned prophecy book *Shaobingge*. None of the standard histories carry any reference to these sensational stories, and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saga were transmitted through oral narration and later recorded by folklorists with additional trappings. Similar versions appeared in a Mongol legend, with both oral and written forms, attesting to the reciprocal influence of Han and Mongol folk culture.

This popular folklore was fictitious; in fact, Chinese peasants rose against the

*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Mongols under the propaganda of the White-Lotus Maitreya society, and the Yuan dynasty did not end until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infighting among contentious Chinese warlords culminating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Nevertheless, there was a modicum of truth in the stories' descriptions of various Mongol repressive measures against the Chinese, such as "ten Han families forced to host a Tartar at home," "ten families sharing a single kitchen chopper," "Mongol headman claiming the first night of a virgin set to marry," "twenty Han families grouped into a household headed by a Northern official," and so forth. Though presented in exaggerated fiction, such events can be traced to Yuan historical records. A crude form of the stories appeared in the early Yuan work *Jinyulu* ascribed to Xu Dazhuo and first printed in the late Qing. It relates how a certain Chinese female in Wu County in Suzhou was molested on her wedding night by the Mongol headman; she killed the headman and committed suicide together with her husband, thus precipitating the villagers of several provinces to rise up against the Mongol chief. Probably inspired by this bizarre source, the anonymous author(s) or promoters of the "killing the Tartars" stories extracted random information from the official Yuan history and Mongol folklore about Mongol officials' callous treatment of the Han Chinese, as well as the alleged eschatological revelation on the intercalary fifteenth day of the eighth (lunar) month proclaimed by the seditious Eight Trigrams Society to buttress the fictional allure of the stories. Finally, they co-opted Liu Bowen to be the mastermind of the moon cake plot that sparked the rebellion to complete the folkloric saga.

Who were the author(s) or promoters of these stories?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ey were either members of anti-Manchu secret societies or revolutionary alliances or their sympathizer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reating these stories they deftly exploit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Han Chinese rebellion against the Mongols and to topple the Yuan dynasty, the mid-Qing propaganda of the Taiping rebels defaming the Manchus as monstrous Tartars, and the popular lore of Liu Bowen prophesizing the demis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y attacked the Mongols as

a stand-in for the Manchus, seeking to propagate the “expel the Tartars, restore Chinese rule” manifesto of the Han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purred by anti-Manchu and Han Chinese superiority fervor, these stories emerged as the most celebrated folklore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and their popularity has survived to this day. However, the drastic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1950s have greatly affected the content and diction of new versions of these stories. The lingering anti-Manchu sentiment and Han ethno-centrism have vanished, and the inter-nationality class struggle ideology and the derogatory ethnic reference to “killing the Tartars” have also gradually disappeared, erasing some of the old tracks of history.

Keywords: Liu Bowen, Liu Ji, Mid-Autumn Festival, moon cake, Mongols, “killing the Tartars”, Yuan Dynasty